臺大歷史學報第40期
2007年12月，頁149~199

BIBLID1012-8514(2007)40p.149-199
2007.6.20收稿，2007.12.17通過刊登

德川幕末知識人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變遷

徐　興　慶*

提　要

日本在幕末維新期，西方列強勢力逼近之際，為汲取西洋近代文明，掀起「蘭學」風潮，而以各藩士族子弟積極吸收兵學、砲術，以備國防之用為最。當時「蕃書調所」為整備高水平教師陣容，聘任諸多具有西洋知識的「蘭學者」。其中箕作阮甫（1799~1863）、塩谷宕陰（1806~1867）、佐久間象山（1811~1864）三人不但修習儒學，亦兼修「蘭學」，同時對列強入侵日本產生高度危機意識，其間彼此思想主張互有激盪與變遷，對日本文明開化有其高度貢獻。

津山藩（今岡山縣）出身的箕作阮甫於1839年出任幕府「天文方」幕僚，並受命為「蕃書和解御用」翻譯官。曾於1853年6月翻譯美國總統 Millard Fillmore（1800~1874）的國書；同年7月，與幕府外交官川路聖謨（1801~1868）共同翻譯俄羅斯使節 Evfemi Vasilievitch Putiatin（1803~1883）的國書。爾後擔任「蕃書調所」之首席教授，其精湛的外語能力與廣博的世界地理知識，影響了德川幕末之國防、軍事政策。

江戶出身的幕府儒官塩谷宕陰精通漢學，有「日東歐陽修」之稱，著有《隔靴論》、《籌海私議》論及日本海防政策，曾是幕府「天保改革」之重要幕僚。宕陰向來關注清廷在鴉片戰爭時的應對措施及其帶給日本之影響，曾致力蒐集相關資訊，集結成《阿芙蓉遺聞》（七卷）及《宕陰存稿》。該著作之內涵最能反映其中國觀之形成過程。

佐久間象山為信州藩士，1853年美國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艦隊叩關日本時，奉命前往浦賀港觀察美國艦隊的動靜，曾提出海防論向幕府獻策。象山從鎖國論的支持者轉變為尊王開國論者，《省嘐錄》即是體現其思想主張的重要原本，其「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前衛的世界觀，對日本的近代化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本文於日本近代化的歷史脈絡中，從思想變遷的角度切入，比較三人的思想異同，並藉由解讀三人的原始史料之內涵，探究其思想體系之形成，同時分別論述三人在傳統儒教與現代文明糾葛的日本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箕作阮甫　塩谷宕陰　佐久間象山　思想變遷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日本關西大學 CSAC 客座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箕作阮甫與德川幕府之開國政策
三、塩谷宕陰的思想主張
四、佐久間象山的思想變遷
五、日本走向世界的起點
六、結論

一、前言

十七世紀初期，德川幕藩體制形成之後，為了禁止洋教、統治思想及鞏固政權，實施了超過二百年的鎖國政策。當時除荷蘭及中國船隻外，斷絕與西歐各國之通商，更嚴禁日本人前往海外。十七世紀中期幕府實施鎖國後，1641 年將荷蘭商館由平戶遷至長崎港內的人工島「出島」，另於 1689 年在港邊山坡地建造「唐人屋敷」（又稱唐館），強制收容中國船員，間接成為日本吸收西洋知識的搖籃。日本近代科學之基礎，肇始於德川時代的「蘭學」，以荷蘭語為媒介，藉由翻譯典籍，將西洋醫學、世界地理知識及產業技術等東傳，影響及於日本學術、文化及科技之發展。德川幕末諸多知識人，更透過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廣泛且直接吸收「蘭學」、「洋學」知識，並加以運用，加速了日本文明開化的腳步。[1]

十八世紀後期，歐洲世界之產業革命及市民革命浪潮湧現，導致西歐勢力東漸，殖民擴張延伸至東亞；歐美貿易商船的逼近，迫使東亞世界的秩序產生了變化。德川中期的日本社會浮現內憂外患之景象，內政方面因物資生產、流通急速發展，農村貧富差距擴大；加上天保期（1833~

1 中山茂將「蘭學」定義為「江戶時代以荷蘭語學習西洋知識、學問的活動」，而「洋學」則涵蓋透過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汲取西洋新知之廣義解釋，二者有所區別。詳請參閱中山茂，《近世日本の科学思想》（東京：講談社，1993），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36）的飢饉天災，米價狂飆，財政惡化，導致農民暴動，人口流向都市，「幕藩體制」出現危機。對外關係方面，1803 年 7 月，幕府拒絕美國商船進入長崎貿易；1804 年 9 月，俄國使節 Rezanov 藉送還日本漂流民的機會，要求進入長崎通商；1808 年，英船 Phaeton 號闖入長崎港。此後，英、俄兩國船隻經常藉機要求進入日本通商，導致長崎奉行松平康英（1768~1808）引咎自殺，幕府不勝其擾，遂於 1809 至 1817 年（文化六～十四年）期間，對進入長崎港的荷蘭商船加倍警戒。然而，外國船隻逼近日本的現象，從北海道至琉球，防不勝防。截至 1853 年（嘉永六年），美國「黑船」艦隊由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領，叩關浦賀（今横須賀市）為止，未見中斷。面對如此內外的社會變動，幕府雖令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推動「天保改革」，[2]卻因以伸張幕府權力為主軸，未能獲得認同，終告失敗。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英鴉片戰爭及培里叩關日本之後，給幕府之國防、外交帶來莫大的挑戰。地方諸藩的知識人在感受西洋勢力入侵東亞之威脅後，深刻意識到瞭解世界的重要性。幕府為了鞏固政權，修改與天皇一體化「公武合體制」之政治路線，導致與諸藩間的尊皇攘夷運動對立頻起，幕府老中之間也掀起避戰、主戰的爭論。地方藩侯與知識人針對如何發展對外關係、確立國防體制，有諸多不同的解讀，幕府與諸藩的衝突持續升溫。[3]

1844 年 7 月，荷蘭軍艦 Palembang 號進入長崎，出示荷蘭國王國書，力勸日本開放門戶；1845 年 6 月，英國船 Samarang 號逼近長崎；1846 年 5 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 J. Biddle 率二艘軍艦出現在江戶灣，要求開港。幕府為因應外國勢力日益增強的威脅，於 1845 年 7 月成立「海防

2「老中」為江戶幕府職名，負責統領全國政務，定員四至五名，每月輪值管理不同事務，遇有重大事件決議時則採合議制。

3 請參閱岩下哲典，〈アヘン戦争情報の伝達と受容——天保 10 年から 13 年まで〉；松田隆行，〈弘化・嘉永期における異国船取り扱方と打払令復活問題——阿部政権期の江戸内海防衛策をめぐって〉，二文皆見明治維新史学会編，《明治維新と西洋国際社会》，收入《明治維新研究史》第 5 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臺灣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掛」，作為對外防禦事務之最高組織；1858 年設「外國奉行」，由老中以下中樞幹部兼職，專門負責對外事務之交涉與應對。1856 年，於九段坂下（今東京都千代田區）創立「蕃書調所」，作為統轄洋學教育的研究機構，主要藉由西書日譯，汲取世界知識。[4]「蕃書調所」創設之際，教授均由蘭學者組成，除荷蘭語之外，也逐步導入歐美各國語言，以擴大翻譯西洋書籍的領域。此外，長崎的「海軍傳習所」亦是吸收西洋科技的機構。美國勢力進入日本後，荷蘭直接贈送軍艦予「海軍傳習所」。1855 至 1859 年（安政二～六年）共四年，分二期教授荷蘭語，並直接傳授天文學、地理學以及航海、造船砲術、測量、機關學、蒸氣動力學、化學、醫學等之技術。當時有眾多幕府官員、各藩技術人員直接接受荷蘭人的專業指導，而成為幕末維新期之領導人物。

幕末維新期，日本各地藩侯除了引進西洋近代產業技術外，更積極普及「蘭學」、「洋學」。本文針對前述時代背景，從思想變遷的角度，解讀箕作阮甫（1799~1863）、塩谷宕陰（1806~1867）、佐久間象山（1811~1864）三位德川幕末知識人之相關文獻，分析十九世紀日本於吸收西洋文明、科技的過程中，三人影響日本文明開化的「異」與「同」，進而探討其思想體系在幕藩體制下之時代意義。

（一）十八世紀德川知識人的世界知識

德川社會從十八世紀初期開始，陸續有介紹海外知識的文獻出現，「蘭學」先驅者新井白石（1657~1725），由來訪的義大利人、荷蘭人口中，探察外國國情、地理、宗教等知識，輯錄成《西洋紀聞》、[5]《采覽

4 「蕃書調所」於 1862 年改稱「洋書調所」，翌年又改稱「開成所」；德川幕府瓦解後，曾經一度關閉。明治政府成立後，改稱「開成學校」（1868），歷經「大學南校」（1869）、「南校」（1871），1877 年後成為東京大學之母體。

5 《西洋紀聞》係新井白石四度審問 1708 年（寶永五年）因違反鎖國禁令被捕之義大利傳教士 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1668~1714）後，針對所得資訊進行考察、整理，於 1715 年（正德五年）集結成冊。爾後並陸續增補資料，直至 1724 年（享保九年），白石六十八歲時才正式完稿。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內容主要記述西洋諸國之歷史、地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言》、[6]《和蘭記事》、《阿蘭陀考》等著作。經世論者工藤平助（1734~1800）撰寫《赤蝦夷風說考》，警告俄國將南下威脅日本。林子平（1738~1793）撰寫《三國通覽圖說》、《海國兵談》，喚起對海外情勢之注意。有「北夷先生」之稱的本多利明（1743~1820），鑽研天文、地理、航海技術，撰寫《西域物語》、《經世密策》，倡導重視北防政策。蘭學、地理學者山村才助（1770~1807），著有《訂正增譯采覽異言》、《印度志》、《西洋雜記》。[7]洋學者青地宗林（1775~1833）翻譯日本最早的物理學著作《氣海觀瀾》及地誌《輿地誌略》。十九世紀後，則有儒者安積艮齋（1791~1860）編輯《洋外記略》三卷，記述西洋各國風土、制度。洋學者渡邊崋山（1793~1841）撰寫《慎機論》，高野長英（1804~1850）撰寫《戊戌夢物語》，同聲批評幕府之攘夷及對外政策，爾後遭遇鎮壓，即所謂「蠻社之獄」。

這些學者多方汲取世界知識，戮力告知朝野人士，在日本的「天下」觀之外，還有一個浩瀚的西洋世界。他們憂心幕府故步自封的鎖國政策，批評保守官僚坐井觀天，呼籲儘速認識外面的世界、汲取文明科技，以因應外來勢力的威脅。由此可見，幕末維新期的知識人世界觀之形成，並非因鴉片戰爭或培里叩關帶來威脅而一夕形成，在此之前已有一段漸進式的發展。幕末知識人在汲取西學、培養世界觀的過程中，掃除了狹隘的空間與地理觀，從「日本主體論」認知到多元層次的文化差異，發現東西方學術本質不同，也感受吸收西洋文明的迫切性，更意識到西方科學之實用性，已遠遠凌駕東方世界的學術理論。箕作阮甫、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三人掙扎於傳統與現代新知的取捨過程中，不但促進了東西文明的對話，也創造了德川幕末新的學問價值。

風俗、宗教。書中出現之外國人名、地名皆以片假名標記，並介紹羅馬字之便利性。

6 《采覽異言》（1713 年，正德三年），同樣是根據審問義大利傳教士 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 所得的資訊撰寫而成，是日本第一本有系統之世界地理書，內容廣泛參考利瑪竇之《坤輿萬國全圖》及荷蘭製世界地圖等，經嚴格考證後，引經據典說明五大洲各國之地理情事。

7 《西洋雜記》（四卷），1848 年（嘉永元年）江戶書林鈴木文苑閣刊行，早稻田大學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鎖國至開國的媒介——西書日譯

1839 年（天保十年），當渡邊崋山、高野長英等人批評幕政被捕下獄，即所謂「蠻社事件」之際，箕作阮甫因與「蠻社」成員鷹見十郎左衛門私交密切，險遭波及。後因阮甫精通荷蘭語，同年 6 月被幕府網羅為「蕃書和解御用出役」，擔任西書翻譯工作，才逢凶化吉。阮甫自幼貧苦，但行醫並非其志業，曾經與友人櫻井隆吉、武田斐三郎有如下的談話：

> 貧窮雖不苦，然東奔西走採藥、行醫，亦不過汲汲惶惶為求溫飽，與時下醫者同流，實覺可恥，故決定捨棄醫業，專心致力洋書之研究、翻譯。[8]

以此擔任幕府翻譯官的機緣，促使阮甫由蘭醫轉向翻譯西書及外交工作發展。

外國勢力壓境，幕府一方面急需海外資訊，一方面擔心西書譯作過度普及，讓民眾感受到外來勢力對政權的威脅。為防止海外資訊無限流傳，幕府祭出「鎖國令」祖法，強化檢閱制度，管制除了醫學之外的譯作出版，全面禁止西書譯作流傳到民間，結果導致 1840 年代的知識人對於西洋文明科技之吸收有停滯現象。[9]鴉片戰爭後不久，《高島流砲術傳書》、《西洋銃陣圖說》等多種譯作問世，天保期的譯作以兵書、解說書居多，計有十八種。幕府為儘速瞭解西洋砲術，動員「天文方」翻譯荷蘭人 J. N. Calten 之《海上砲術教諭手引》（*Leiddraad bej het Onderrigt in de Zee-Aritilleri,* Delft, 1832）。該書於 1840 年（天保十一年）傳入日本，當時幕府僅有原文一冊，為爭取時效，拆成六份，由箕作阮甫、宇田川榕庵、品川梅次郎、竹內玄同、杉田成卿、杉田立卿等六人同時進行翻譯。阮甫負責卷六至卷八〈煩車〉及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海岸攻

8 玉木存，〈蘭学への道〉，收入氏著，《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東京：創林社，1983），98。

9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收入洋学史学会編，《洋学史学会研究年報・洋學 2・特集・箕作阮甫》（東京：八坂書房，1994），6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守〉，[10]於 1843 年（天保十四年）完稿，但遲至十二年後，1854 年（嘉永七年）培理二度叩關之際，才以《海上砲術全書》（二十八卷十四冊，附海上礮具全圖一帖）發行。此外，諸如《砲彈製造教本》、《粉砲考》等技術層次之譯作亦相繼問世。弘化年間（1844~1847），翻譯西洋砲術的書籍共二十一種，嘉永年間（1848~1853）更多達三十六種。[11]這一連串西書日譯風潮，帶動了知識分子對西洋文明科技的關注，是促進日本逐漸走向「開國」的原動力。

二、箕作阮甫與德川幕府之開國政策

箕作阮甫名虔儒，字痒西，號紫川，1799 年（寬政十一年）出生於津山藩（今岡山縣）西新町之醫學世家。漢學家永田敬藏（桐陰）、小島廣厚（天楽）為其啟蒙老師。1816 年（文化十三年），阮甫赴京都學醫；1823 年（文政六年），隨藩主至江戶，入津山藩醫宇田川玄真（榛斎，1799~1836）之門修習蘭學。1839 年（天保十年），出任幕府天文臺幕僚，當時幕府成立「蕃書調所」，進用諸多具有西洋知識之「蘭學者」，阮甫即受命為「蕃書和解御用」翻譯官。[12]1853 年 6 月，培里首次叩關之際，阮甫奉命翻譯美國總統 Millard Fillmore（1800~1874）之國書；同年 7 月，翻譯俄羅斯使節 Evfemi Vasilievitch Putiatin（1803~1883）之國書，並與「勘定奉行」川路聖謨（1801~1868）同赴長崎，代表幕府對俄談判，爾後回任「蕃書調所」之首席教授。阮甫充分發揮其外語能

10 菊池俊彦，〈箕作阮甫の自然科学〉，收入蘭學資料研究會編，《箕作阮甫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78），164。當時翻譯的底本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譯稿則由早稻田大學收藏。

11 佐藤昌介，《洋学史論考》（京都：思文閣，1993），300~301。

12 天文臺由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48~1751）建於 1744 年（延享元年），寬政、文化年間之後，外國船隻來航頻繁，幕府為翻譯外國文書，於 1811 年（文化八年）5 月設置翻譯局，又稱「蠻書和解方」。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翻譯外交文書、世界地理圖誌，是幕府對外交涉的智囊成員之一。此外，阮甫創辦日本最早的醫學雜誌《泰西名醫彙講》，[13]著有《外科必讀》、《產科簡明》等醫書，其他如《和蘭文典》、[14]《海上砲術全書》（合譯）、《水蒸船說略》、《八紘通誌》、《西征紀行》等譯作，計有醫書十七部、西洋史書十部、西洋地理書十部、西洋兵書四部、地質書三部、礦物書二部、應用工藝書五部、海外形勢書四部、旅遊紀行二部、詩集三部、隨筆三部，共一百六十餘冊，[15]領域跨及語學、兵學、造船學、地理學，對於普及日本的西洋知識，多所貢獻。

（一）箕作阮甫與世界地理研究

十八世紀末，日本對世界地理之研究已穩健進展，但其內容新舊參雜，缺乏最新資訊。十九世紀初，幕府「天文方」高橋景保（1785~1829），率先將英國探險家 T. Cook 之世界地圖公開，並將英國 A. Arrowsmith 描繪的世界圖，製作成幕府官方的世界地圖《新鐫總界全圖》（1809）及《新訂萬國全圖》（1810），較以往的世界地理圖更具參考價值。不過最早在日本民間流傳的世界地圖，則是阮甫、省吾翁婿於鴉片戰爭後繪製的《新製輿地全圖》（1844）及地誌《坤輿圖識》（1845）。[16]

1.《新製輿地全圖》

《新製輿地全圖》參照高橋景保的《新訂萬國全圖》，維持「五大陸」之架構，只是高橋的圖示以日本為中心，而阮甫、省吾則採用較新的荷蘭史料，將歐洲納入主要視野。《新製輿地全圖》是幕府許可出版

13 《泰西名醫彙講》自 1836 至 1841 年（天保七～十二年）共刊行六冊，講師除箕作阮甫外，另有牧穆中、堀內忠亮、緒方洪庵等醫師輪講。

14 《和蘭文典》（*Grammatica of Neederduitsche Spraakkuunst*）為荷蘭語之文法書，分《和蘭文典．前編》（1842）與《和蘭文典成句法．後編》（*Syntaxis of Woordvoeging der Nederduitsche Taal*，1848）。此書為德川末期普及蘭學之重要工具書。

15 吳秀三，《箕作阮甫》（東京：大日本圖書，1914；京都：同朋社，1973 復刻），4~5。

16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漢字、假名參雜之世界地理書，其凡例說明，該圖以平射圖法改為兩半球圖，重新描繪經緯度線，並標示原圖所顯示的世界各地海洋線及國境。[17]省吾亦在凡例中說明：「五大洲中，各國獨立者有之，不獨立者有之。其不獨立者，以國字符，表其附屬之所。」標示殖民地歸屬之宗主國，其主要目的在於關注十九世紀殖民帝國主義的動向。[18]鴉片戰爭後，阮甫於 1841 年（天保十二年）致函親戚大村斐夫時，述及：「唐土大國甚且陷於攻掠威勢之下，本邦蒙受其害之期亦不遠矣。」[19]西方勢力入侵東亞的行為，讓阮甫備感威脅。

《新製輿地全圖》採用新記述法，將世界各國分成「獨立國」及「附屬國」，並以降一格的方式表記「附屬國」。阮甫、省吾已經意識到獨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三谷博認為，《新製輿地全圖》在架構上，已經蘊涵將中華文明圈內的藩屬國視為劣等區域的思維。[20]

2.《坤輿圖識》與《坤輿圖識補》

《坤輿圖識》是與《新製輿地全圖》平行的世界地理書。前述十八世紀前期在日本出現的世界地理書，泰半為收集十七、十八世紀荷蘭人之片段紀錄。《坤輿圖識》共分五卷三冊，[21]各卷頭附有總論解說，內容介紹各國風土、人口、歷史興衰、產物、機械等，屬於較新的世界地理啟蒙書。其編輯將「亞細亞」置於首卷，以「皇國」為世界核心，並以「漢土」取代「中國」或「大清」之記載。值得關注的是，卷五〈豪

17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78。

18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79。

19 箕作阮甫致大村斐夫書信，原書未見。轉引自玉木存，《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13。

20 三谷博，〈「アジア」概念の受容と変容——地理学から地政学へ〉，收入渡邊浩、朴忠錫編，《韓国・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変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207。

21 《坤輿圖識》內容為，天：卷一，亞細亞誌（亞洲）；地：卷二，歐邏巴誌（歐洲）、卷三，亞弗利加誌（非洲）；人：卷四，亞墨利加誌（南、北美洲）、卷五，豪斯多辣利誌（澳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多辣里誌〉共列舉十四項目，幾乎掌握了整個大洋洲之概況，此卷係根據阮甫的譯作《豪斯多辣利譯說》編輯而成。《坤輿圖識》之序文由佐賀鍋島藩儒者、昌平坂學問所教授古賀侗庵（1788~1847）執筆，主要呼籲日本重視國際關係之發展，並加強國防軍備，否則將難以立足於國際社會。截至福澤諭吉（1834~1901）出版《西洋事情》（1866~1870）為止，《坤輿圖識》是當時在日本最廣為流傳的世界地理書。

1846 年（弘化三年），省吾又寫《坤輿圖識補》（四卷四冊），主要補述《新製輿地全圖》對各地域、國家、都市說明之不足。卷一〈輿地總說〉，介紹水源、河川、地震、山脈、冰山、沙漠等自然地理。卷二〈亞細亞誌〉之「漢土」，主要批評中華思想，同時解說「廣東」、「媽港」、「香港」之最新資訊，資訊來自幕府備藏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刊行之啟蒙雜誌 *Nederlandsch magazijin*（1834~1845）。[22]卷二後半〈米利幹誌〉，介紹哥倫比亞、智利獨立運動、美國華盛頓政府之成立及其海軍現況。卷三〈歐邏巴誌補〉，說明德、俄、法、英各國的人口，並重點介紹各國陸海軍現況。卷四〈人物略傳〉，則根據阮甫譯作《西史外傳》，記載相關人物之略傳。

《坤輿圖識》等書掌握世界六大洲輪廓，並細部記述各國國情，對德川幕末之世界地理知識普及有深遠的影響。這些翻譯、編輯之浩大工程並非省吾獨力完成，阮甫的外孫吳秀三即指出：「以贅婿為名刊出的這些著作，其岳父勞筆勞心之處頗多，將之視為箕作阮甫的著述亦不為過。」[23]阮甫將汲取歐洲最新資訊，列為其翻譯或編輯工作之首要課題。

3.《八紘通誌》

箕作省吾完成《坤輿圖識補》後，二十六歲即英年早逝，阮甫為遂其遺志，於 1851 年（嘉永四年）繼續完成《八紘通誌》六卷。「八紘」意指世界，原預定刊行續編「亞細亞部」，因西洋勢力壓境，先出版〈歐

22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84。
23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邏巴部初編〉（三卷，1851）、〈歐邏巴部二編〉（三卷，1855），作為探索歐洲世界之地理書誌。阮甫於凡例中提及：

> 若夫近二十年來新獨立成國，若賴大國格外防護初建國等，沿革亦極多。亡兒〔省吾〕力坤輿圖識及補，雖記其大略，脫漏處猶不少。今擇其未載處，且記喪亂後各國政治善惡、國勢強弱、風俗污隆、財貨豐嗇、學術盛衰、兵備眾寡、產物贍乏等。務查識方今彼洲各國形勢，偫探察事情。豈敢妄誇張彼事，謂抹人耳目也。[24]

阮甫譯述《八紘通誌》，引用了十二種「蘭書」，[25]是當時日本最新之歐洲歷史地理誌，架構類似《坤輿圖識》，不同的是阮甫將〈歐邏巴洲總說〉置於前卷，後半則依地域區分，順序介紹各國山川、都市、海灣等自然地理，前後組合完全不同。「歐邏巴部初編」主要記述 1830 至 1850 年間歐洲情勢變化，「務查識方今彼洲各國形勢，偫探察事情」是《八紘通誌》之重點所在，近二十年世界新獨立國之動向仍是阮甫最關注的焦點。此外，《八紘通誌》卷一冒頭附有「新模歐羅巴圖」及「北極心之圖」二張摺頁，模版刻自阮甫摯友鷹見泉石持有的德國人 Adolf Stieler（1775~1836）之《Stieler 地圖帳》（1828 年版）。鷹見泉石的《新譯和蘭國全圖》及幕府官撰《重訂萬國全圖》，皆依 Adolf Stieler 版轉製而成。當時積極汲取世界地理知識之佐久間象山亦持有「新模歐羅巴圖」，此為德川幕末最新、最精緻之歐洲地圖。[26]

（二）箕作阮甫與攘夷、開國之抉擇

培理叩關日本時，攜帶美國 Millard Fillmore 總統致將軍德川家慶

---

24 箕作阮甫，《八紘通誌》六卷（須原屋伊八刊行，嘉永四年〔1851〕～安政三年〔1856〕；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

25 詳請參閱岩田高明，〈箕作阮甫訳述『八紘通誌』の西洋教育情報——近代日本教育制度の形成過程の基礎研究〉，收入安田女子大学編，《安田女子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開設記念論文集》（廣島：安田女子大學，1997），30~31。

26 鮎澤信太郎、大久保利謙著，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編，《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東京：乾元社，1953），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93~1853）之國書，力勸日本開國，內容極為強勢，其「漢文」要點如下：

> 日本亦然富澤，多產寶物，人明曉多藝，故此兩鄰國互相往來，必得大益，朕亦為此要開商意矣。茲知悉日本國之古例，只准中國、蘭國船能通商，除此二國之外，不准別船進埠，祇因世間之情、萬國之政漸漸多有改變，古例易新，且貴國初立古例之時，亜美理駕即名新地毬，由欧羅巴人離本處，入住此山，墾地耕種，在彼長久，人民為少且貧，迨今民生繁華，貿易年年盛布各處，量殿下盡悉，倘能改古例，以准我兩國人買賣，則各伴得大益矣。……且聞貴國多產煤炭，食物繁盛，故諭飾〔按：飭〕該欽差面告，本國火輪船渡平海去中國者，計燒煤炭数萬石，其船不能多裝，在途不敷足用，無從接濟，而回本國又不便。所以各船要入貴國港口，買煤炭食物接濟，並取水之便。如買物，或將銀錢，或以各貨兌之，可也。請君主議指南境一港口，能使本國各船暫泊，而得買此須物，兼打食水，此事務希速即允准、免朕遠望而快心也。[27]

阮甫認為美國強勢之外交姿態，不講道理。除美國外，西方諸國仗其強大的軍事後盾，擬將東亞各地逐步納為殖民地。是否得以如強硬派所主張的攘夷政策，順利加以防堵？若採取開國政策，是否得以確保國家獨立及主權不受侵犯？事態之嚴重，並非攘夷、開國二擇一即可輕易解決。身為幕府決策者的智囊團成員之一，阮甫感受到日本若走錯一步，將重蹈清朝覆轍，曾向對俄談判之同僚井筒政憲言及：「船艦一旦整備完成，將親自渡美，責問美國之不當行為。但道理若講得通，終究必須允許美國前來通商。」[28]可見其認為日本門戶的開放只是時間與條件的問題。

---

27 「合衆國書翰和解（1852 年 11 月 13 日）」，《史料に見る日本の近代》（日本國會圖書館藏）。Millard Fillmore 總統國書計有漢文、漢文和解（日文譯文）、蘭文和解及英文四種版本。另收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10~1926），第一卷，第 114 號，238~251；箭內健次編，《通航一覽續輯》（大阪：清文堂，1972），第 128 卷，477~482。

28 玉木存，《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船艦之整備，阮甫早在 1849 年（嘉永二年）9 月，培理叩關前四年，即應薩摩藩主島津齊彬（1809~1858）所託，完成荷蘭人 G. J. Verdam 之製造蒸汽船著書 *Volledige verhandeling over de stoomwerktuigen*（1837）的翻譯工作，薩摩藩以《水蒸船說略》（六冊，附圖一卷）為名刊行。薩摩藩地處九州南端，國際船隻往來頻繁，貿易活動向來熱絡，因此給島津齊彬帶來洞察世界情勢，充實國防軍備及汲取西學之便。《水蒸船說略》之學理，成功製造出蒸汽機（steam enging）之雛形，並於培理二度來航的 1854 年 7 月完成船舶用蒸汽機之研發；1855 年 7 月，蒸汽機成功搭載於船舶，成為日本第一艘自製軍船，齊彬將此船命名為「昇平丸」，通航於薩摩（鹿兒島）與品川（東京）之間。[29]

1853 年 11 月 8 日，阮甫於其日記《西征紀行》中寫道：

> 翻閱 T. J. Kramers 之地理書前後部分，對英夷之強大極為驚訝，並羨慕安南、暹羅等地蒸汽船及兵艦之齊備，甚感憂心。[30]

阮甫提及的地理書，是荷蘭人 T. J. Kramers 於 1850 年（嘉永三年）出版的《地理．統計．歷史便覽》（*Ceographic-statistic-historisch handboek*），加強蒸汽船及兵艦之整備，以對抗「英夷」強大勢力是其關注的焦點。培理叩關後，阮甫經常向上司川路聖謨敘述有關歐洲諸國之地理、國情、產物、兵力，並說明鴉片戰爭大敗清朝的英國強大勢力，恐將威脅日本，整頓軍備刻不容緩。川路對於西洋問題向來依賴阮甫，要求阮甫：

> 列舉出西洋譯著中，特別對國家有助益之書單，諸如可瞭解其風土、人情或兵書等。翻譯內容毋有誤謬，請介紹專門探討政事或相關心得之著作書籍各一、二冊。[31]

川路認為西洋優秀的兵器砲術，非古來日本或「漢土」兵法可以比擬，明白透過西書譯作導入西洋技術之必要性。

1855 年（安政二年）6 月，川路向老中阿部正弘提出六項整頓軍備

---

29 吳秀三，《箕作阮甫》，212。

30 木村岩治編，《箕作阮甫．西征紀行》（津山：津山洋學史料館友の会，1991），301。

31 玉木存，《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改革建言：（1）海防之整備實為必要，為求「知彼」、「取他人之長，探他人之短」，應致力翻譯西書；（2）譯書以砲書、築城、軍艦製造、航海測量、水陸練兵等軍事技術書為先，並及於器械、國勢強弱、地理物產；（3）設置專責翻譯御用之「調所」，並於其內設立蘭學堂，以培育人才；（4）設置口譯專修科，培育幕府駐港口之口譯人員；（5）調所內設接待室、會議室、調查室、學堂、書庫及各部門管理人住宿設施；（6）「調所」之組織包含主管、教師、翻譯者、校正者、記錄、傳遞、雜務及管理人。[32]上述建言，其實主要出自阮甫。重點在於成立翻譯常設機構，培育翻譯及口譯人才，以知彼知己的態度，因應外來勢力之入侵。翌年「蕃書調所」順利成立運作，阮甫成為該所之教授。然而幕府礙於財政困難，對於增購軍艦、加強設備未積極回應。對此，阮甫提出警訊：

> 外夷警備，宜發令戒嚴。平時武器等雖有所調度，然看似一統盛世，以半信半疑之心態備武，極力避免耗費財力，一旦有所動亂，事關國家大事，勢將一敗塗地。[33]

阮甫於去世前一年，1862 年（文久二年）9 月，向幕府「頭取」古賀謹一郎（1816~1884）提出「洋學勸督存意書」四點答辯，內容為：（1）「招聘三五蘭人、英人，依其專長教授技藝」，主張直接向外國人教師學習；（2）嚴選教授，以受學生信賴、「讀書精敏、博學多聞或長於一學科者」為佳；（3）設置學生宿舍，廣納各藩人才；（4）整備洋書，廣泛收集「各學科中優良及未備齊之書」，「不限荷蘭書，英文亦同」。[34]阮甫念茲在茲地訴求應借重西洋教授之專才及西書知識，培育人才，以因應日本門戶開放，立足於國際社會所需。

阮甫汲取世界地理知識之另一管道，為校注或訓點《海國圖志》、《瀛環志略》、《地球說略》、《聯邦志略》等典籍。1853 年 10 月，阮甫

32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74。
33 玉木存，《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29。
34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川路聖謨赴長崎與俄國使節 Evfemi Vasilievitch Putiatin 談判之際，川路於長崎奉行所購得一部《海國圖志》。川路認為《海國圖志．俄羅斯國部》之相關記載，有助於日本對俄交涉，因而商請阮甫、塩谷宕陰進行校訂，並出版和刻本。當時幕府對於西洋譯書管制甚嚴，但宕陰曾經參與老中水野忠邦之「天保改革」，又是幕府直轄學問所「昌平黌」知名教授，因此《海國圖志．籌海篇》二篇於短期內即核准翻刻完成。

川路翻刻〈海防篇〉，除了作為自己任職「海防掛」所需國防外交政策之參考外，另有呼籲幕府當局開放海外資訊之雙重意義。當時幕府的「外國奉行」岩瀨忠震（1818~1861），受到川路影響，也請阮甫、宕陰於 1858 年(安政五年)翻刻英國傳教士 William Muirhead(1822~1900)之《地理全志》（1853 年刊）。阮甫補注該書九卷三冊，並將地名注記英文及漢字，宕陰則負責撰寫序文。[35]此後，校注漢籍地理書成為阮甫的重要工作之一，1860 年(萬延元年)完成美國傳教士 Richard Quaterman Way（1819~1895）之《地球說略》，翌年完成徐繼畬（1795~1873）之《瀛環志略》八冊，及林則徐（1785~1850）《四洲志》之原本《聯邦志略》等書的訓點工作。[36]

阮甫因翻譯幕府的重要外交文書，又廣泛吸收世界地理知識而通曉國際情勢，因此對於西洋列強頻繁進逼日本之舉動，都能洞察機先，具體掌握。

（三）《聖武記》、《海國圖志》的東傳及其影響

日本社會真正認識世界、接納西方思想，主要始於明治維新之後。但中日學者大多將鴉片戰爭帶給日本的危機，視為其吸收西洋知識的前哨。除了幕府高層外，箕作阮甫、塩谷宕陰及安井息軒、橫井小楠(1809~1869)等諸多地方藩士、儒者，亦藉由《海國圖志》吸收世界地理知識，

35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地理学〉，收入蘭學資料研究會編，《箕作阮甫の研究》，247。

36 《聯邦志略》，美合眾國誌，上、下二冊。其訓點本於阮甫去世翌年 1864 年刊行。蘭學資料研究會編，《箕作阮甫の研究》，249~2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逐漸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

《聖武記》於 1844 年（弘化元年）入傳日本，1850 年部分被翻刻成《聖武記採要》，1851 年《海國圖志》亦由貿易船舶載至日本。這兩部書旋即成為幕府的國防參考用書，民間出版業者爭相翻刻，成為日本朝野汲取外國知識的重要讀物。[37]但幕府為鞏固政權，全力防堵海外危機滲透日本社會，對於載有世界地理知識，如《海國圖志》之類的舶來書籍，一律嚴格扣留。有關幕府扣留《海國圖志》之不當處置，川路聖謨曾向老中阿部正弘說明該書之重要性：

> 魏源之《海國圖志》有舶載數本，密藏於將軍文庫，請聖謨閱覽後，知該書內容多新說奇聞，有所益，遂將其旨趣告知阿部閣老〔老中阿部正弘〕……勢州〔阿部〕認為此有用之書留置庫中並無其理，不如將此書數部下交閣老及參政閣員，令其熟讀，以備必要之需。將軍即准其所請，分賜閣老及參政閣員，聖謨聞之，讚為美事。[38]

《海國圖志》之翻刻，集中於 1854、1855 年間，且以「亞墨利加（美國）」之部居多。這是培理叩關後，日本朝野亟需瞭解美國國情所致。川路聖謨於幕府急需外國資訊之情況下，委請箕作阮甫、塩谷宕陰訓點六十卷本之《海國圖志》，此為漢學家與洋學者以不同角度校訂完成之最早版本，是日本朝野人士爭相購閱之世界地理誌。據源了圓研究，當時幕府對《海國圖志》有三種需求：（1）儘速翻刻多種版本、（2）各種版本要有和刻（日譯）本、（3）翻刻重點在〈籌海篇〉及〈籌夷篇〉。[39]

---

37 有關《聖武記》、《海國圖志》舶載日本之詳情，請參閱：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森睦彥，〈《海國圖志》の舶載から翻刻まで〉，蘭學資料研究會，《研究報告》206 號（1968，東京）；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歷史地理》第 68 卷第 4 號（1936，東京）。另，《聖武記》、《海國圖志》對日本之影響，請參閱：筆者，《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94~117。

38 川路寬堂編述，《川路聖謨之生涯》，收入大塚武松、藤井甚太郎編，《川路聖謨文書》（東京：日本史籍協會，1970 覆刻吉川弘文館 1903〔明治 36 年〕初刊本），350~351。

39 源了圓，〈幕末における中国を通しての「西洋学習」——《海国図志》の受容を中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鮎澤信太郎之統計，1854 至 1856 年間，《海國圖志》之翻刻本（含部分翻刻）多達二十三種。[40]

對於翻譯《海國圖志》之緣由，宕陰於 1854 年（嘉永七年）6 月〈翻栞海國圖志序〉中，敘述如下：

> 此書為客歲清商始所舶載，左衛門尉川路君〔川路聖謨〕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亟翻栞，原刻不甚精，頗多譌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稱，則津山箕作庠西〔阮甫〕注洋音於行間。[41]

此外，經由翻譯《海國圖志》，宕陰瞭解到日本以外的世界，對外思想開始有了轉變，亦知「知己知彼」之重要性，曰：

> 及讀《海國圖志》，則又謂此懲毖外篇也，記以省我，圖志以知彼。英主碩輔，能斟其意擇其策，舉而施諸政事，則轉禍為福、變凶為吉，無難也。此編則原歐人之譔，採實傳信，而精華所萃，乃在〈籌海〉、〈籌夷〉、〈戰艦〉、〈火攻〉諸篇。夫地理既詳，夷情既悉，器備既足，可以守則守焉，可以戰則戰焉，可以款則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資，名為地志，其實武經大典，豈瑣瑣柳書之比哉。[42]

宕陰認為〈籌海〉、〈籌夷〉、〈戰艦〉、〈火攻〉各篇描述歐洲地理資訊以及「器備」等，值得汲取與借鏡；《海國圖志》是足以作為日本對外攻守參考的武備經典。他又指出：

> 從前漢人以華自居，視外蕃不啻犬豕，於其地理政治，懵乎如瞽矇摸器，雖間有《異域圖志》、《西域聞見錄》、《八紘譯史》荒史之類，大率荒唐無稽之談，鮮足徵者焉。[43]

として〉，收入源了圓、嚴紹璗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第 3 卷，「思想」，336~337。

40 鮎澤信太郎、大久保利謙，《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135~153。

41 塩谷宕陰，〈翻栞海國圖志序〉，《宕陰存稿》（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東京：山城屋政吉，1870），卷 4，頁 13。

42 塩谷宕陰，〈翻栞海國圖志序〉，《宕陰存稿》，卷 4，頁 11~12。

43 塩谷宕陰，〈翻栞海國圖志序〉，《宕陰存稿》，卷 4，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知西洋器藝之精，或惜財而弗造，或憚勞而弗習，與鄂之比達王躬游諸州以師其長技者異矣。[44]

批評清廷失敗的原因在於以華自居，自負而怠惰，吝惜將財力、心力用於製造與學習精緻之西洋器藝。魏源（1794~1857）「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說，雖為良策，但「斷之不明，行之不速」，難以發揮禦敵的效用。強調吸收西洋科技首重應用，絕非止於理論而已。

清廷於 1861 年真正推動自強運動後，才將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觀念列入考慮，足足晚了十年。宕陰感嘆曰：

>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悲焉，而并為清主悲之。[45]

忠君憂國的魏源辛勤編著《海國圖志》，呼籲中國走向世界，卻不為重視，再次印證了宕陰對清廷故步自封的消極態度強烈不滿。此外，宕陰於〈地理全誌序〉中述及：

> 近代譯西輿地書，以《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為核實。然《圖志》失於雜，《志略》主於事蹟，皆未能悉於《方輿》。此書西洋士所撰，雖間有疎謬，而芟冗抉蕪，蓋得二志之要。瀏覽三日，略足以瞭五州之大勢，則講地理者，安得不以此為捷徑焉哉。[46]

雖然對於《海國圖志》及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二志內容有所批評，但仍肯定其不失為迅速瞭解世界五大洲地理知識之捷徑。

對此，佐久間象山亦不例外，在讀過《聖武記》、《海國圖志》後，其世界觀也隨之轉變。[47]鴉片戰爭開戰後不久，兵學家高島秋帆（1798~1866）從長崎入港的清、荷二國商人處獲得戰爭資訊，旋即於 1840 年 9

---

44 塩谷宕陰，〈翻栞海國圖志序〉，《宕陰存稿》，卷 4，頁 12。

45 塩谷宕陰，〈翻栞海國圖志序〉，《宕陰存稿》，卷 4，頁 13。

46 塩谷宕陰，〈地理全誌序〉，《宕陰存稿》，卷 5，頁 9~10。

47 高增杰，〈西欧的世界観の受容と改造〉，收入西洋思想受容研究會，《西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福沢諭吉からジョン・ロールズまで》（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2），16。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月上書幕府，指出清廷戰敗主因在於砲術不精，主張將改善砲術列為當急要務。[48]1841 年 5 月，幕府准許秋帆演練砲術；翌年秋天，信州松代（今長野市）藩主真田幸貫（1791~1852）調任幕府「海防掛」，為蒐集海外情報，聘任佐久間象山為顧問，爾後象山提出「海防八策」。[49]讀魏源《聖武記》，象山有感而發，曰：

> 先公〔真田幸貫〕登相臺，嗣管海防事。時英夷寇清國，聲勢相逮。予感慨時事，上書陳策，實天保壬寅〔1842〕十一月也。後觀清魏源《聖武記》，亦感慨時事之所著，而其之序，又作於是歲之七月，則先予上書僅廑四月矣。而其所論，往往有不約而同者。嗚乎！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闇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50]

與魏源雖處不同國度，但二人在因應西方勢力入侵之上書陳策，卻有「不約而同」之處，英雄所見略同，象山不禁稱魏源為「海外同志」。此時象山並未言及鎖國或開國等外交政策議題。

關於《海國圖志》，佐久間象山的看法是：

> 其在江都日，始獲魏氏之書而讀之。亦欲內地設學，專譯夷書、夷史。瞭悉敵情以補於駕馭，是又其見之與予相符者，第不識彼國今日能用其言否耳。[51]

藉翻譯西書掌握敵情，此為象山與魏源理念相同之處。然而在實踐、應用層面，二人則有不同作法。象山認為：

---

48 金子鷹之助，〈幕末に於ける開国攘夷論争と秋帆・象山の歴史的位置〉，收入高島秋帆、佐久間象山著，金子鷹之助解題，《高島秋帆集・佐久間象山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6），27。

49 「海防八策」主要內容在預測日本即將有外寇入侵，倘若不事先預防，恐將遭受恥辱。因此建議中斷與荷蘭之間的銅輸出貿易，大量製造西洋大砲，同時向荷蘭訂購十二艘軍艦，招聘荷蘭之兵學者、鐵砲師傅、船工等人，編成海軍，期使日本短期內能製造出軍艦與槍械。

50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收入宮本仲，《佐久間象山》（東京：岩波書店，1932），258。

51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海防之要，在礮與艦，而礮最居首。魏氏《海國圖識〔志〕》中，輯銃礮之說，類皆粗漏無稽，如兒童戲嬉之為。凡事不自為之，而能得其要領者，無之。以魏之才識，而是之不察。當今之世，身無礮學，貽此謬妄，反誤後生，吾為魏深惜之。[52]

象山批評魏源收集的槍砲資訊「粗漏無稽」、形同兒戲，無法運用。認為魏源既是如此，更遑論清廷對海防之無知。異於魏源，象山主張凡事自為之，強調從研習砲術、自製槍砲著手，方能得其要領而加以運用，延續了宕陰主張「應用」西洋科技的想法。

三、塩谷宕陰的思想主張

（一）塩谷宕陰的學術風格

塩谷宕陰（1806~1867）十六歲進入昌平黌，與考證學者安井息軒（1799~1876）、松山藩儒山田方谷（1805~1877）為同窗，是專攻漢唐注疏的考證學者松崎慊堂（1771~1844）之入門弟子。遠江浜松藩主水野忠邦擔任幕府老中時，宕陰曾任其「天保改革」之顧問，而活躍於德川幕府的政治舞台；爾後與同為昌平黌教授之安井息軒、芳野金陵（1802~1878）被譽為「文久三博士」。宕陰得知鴉片戰爭之消息後，旋即編輯《阿芙蓉彙聞》、《籌海私議》等書，論及日本海防。1854 年，培理叩關之際，提出「便宜二十ヶ条」，建議幕府建造軍艦；此外，撰寫《隔靴論》等，評論日本時事，晚年擔任幕府儒官。宕陰有「日東歐陽修」之稱，與《日本外史》的作者賴山陽（1780~1832）同為德川後期知名漢學家。著作有《宕陰存稿》（十七卷）、《昭代記》（十卷）、《隔靴論》（一卷）、《阿芙蓉彙聞》（七卷）、《籌海私議》（一卷）、《通商利害論》等。

宕陰十九歲入松崎慊堂門下，由《宕陰存稿》收錄之相關書簡及其生平著作，可窺知其求學過程與學風之形成。《宕陰存稿》計十三卷，

52 佐久間象山，《省僊錄》，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補遺一卷，於宕陰去世後 1867 年（慶應三年）至 1870 年（明治三年）期間編成。[53]宕陰在比較中日禦侮策略之異同、西洋科學之接受過程中，常受到傳統儒學的影響。以下擬就《宕陰存稿》之相關內容，分析其學說理論與思想主張。其於〈呈慊堂先生書〉中提及：

> 學術則信徂徠物氏，人物則慕蕃山熊澤氏，以為讀書觀大而足，文章兒戲不足修，學問必見於事功而止矣。逢人輒高談放論以為快事，是以初見日，即及蕃山事。先生喻以功名不可期，儒者之業唯在經義文章。[54]

於〈函洲遺稿序〉中亦云：

> 余則少時治物徂徠學，長研程、朱書，然不能如世所稱道學家，而性朴訥椎魯，喜砥礪廉隅，嘗戲之曰：「卿風神似萱園諸子，而所好乃宋學。」余學出物氏，而鍊心似洛閩書生，而投合如此，此理之不可解者。[55]

由此可見，宕陰求學以朱子學為宗，尊崇古文辭學派之荻生徂徠（1666~1728），且仰慕陽明學派之熊澤蕃山（1619~1691）。其學問主張以「見於事功而止」，讀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曰：

> 今人欲學道，蓋未有能用旬月精力者。不若歸家杜門，以二三年為期，取四子六經，反復讀之。體究諸身，然後就正良師，斯可矣。[56]

讀慊堂先生〈答茗澗林公書〉後，又曰：

> 古之學者，專力絃誦。某欲依其法，簡緣省事，就靜僻閑院，取九經三史等書，各誦五六千言。其間則依朱子讀書法，益研尋其義。如此數年，學庶乎達矣。先生之言，朱子之訓，篤信而敬奉，以期於必行。[57]

---

53 《宕陰存稿》，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

54 塩谷宕陰，〈呈慊堂先生書〉，《宕陰存稿》，卷 2，頁 14~15。

55 塩谷宕陰，〈函洲遺稿序〉，《宕陰存稿》，卷 5，頁 10~11。

56 塩谷宕陰，〈呈慊堂先生書〉，《宕陰存稿》，卷 2，頁 15~16。

57 塩谷宕陰，〈呈慊堂先生書〉，《宕陰存稿》，卷 2，頁 1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朱子之訓是宕陰篤信之求學管道，曾回憶自幼研讀經典之過程，曰：

> 甫四歲，手執《孝經》授讀，每有疾風迅雷凡可怖之事，令朗誦《孝經》。稍知握筆，令手寫《中庸》而後教之，謂寫必善記。及授《論語》，依音直誦，蓋慮訓點之害也。[58]

宕陰對於治史亦有涉獵，自謂：「世弘少年好讀稗史，尤博究國初事，竊有志於修史。以謂搜羅百氏，非獨力所能辦。」[59]曾為藩主水野忠邦編修家譜九卷。

宕陰於〈六藝論〉中，對「洋學」、商賈、貿易作了如下批評：

> 洋夷之學，隨形器耳。道則淺矣，謀富強耳。自本而末，自身而國者瞽矣。故有推測之知，而無通悟之明。主利用而鮮務乎躬行，嗚燠休以攻人之不仁，詡硜硜以責人之不義。其學則疇人，其治則申商。禮樂和讓之訓，則漠焉無矣。無取乎洋夷者，恨漢唐宋明之失官爾。且夫洋夷以貿易建國，貿易也者，盜賊之漸也。……嗚呼，商賈盜賊，猶知磨礪學術以造材，今以衣冠禮樂之邦，卻不能及商賈盜賊，哀夫。[60]

其根本的儒教觀在於道德本位主義，認為吸收西洋文明必須置於道德基準之上。理想的文明世界，不應以形器之優而一昧追求利益，必須從實踐道德的務實態度作起，漸進於國家，而且要秉持「禮樂和讓」的原則，因此堅持傳統儒教的道德治國論。然而，在西洋國際社會中，以器物之先進與利害關係為主流，優勝劣敗是當時的風潮，其以道德治國的理論並非德川幕末的主流思想，自然難以被民眾接受。

（二）塩谷宕陰與《阿芙蓉彙聞》

英國勢力入侵中國，引發鴉片戰爭之消息傳出，隨後外國船隻陸續

58 塩谷宕陰，〈呈慊堂先生書〉，《宕陰存稿》，卷 2，頁 13。
59 塩谷宕陰，〈請修史書〉，《宕陰存稿》，卷 2，頁 20~21。
60 塩谷宕陰，〈六藝論・五〉，《宕陰存稿・補遺》，頁 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逼近日本，強行要求「開港」。日本朝野人士從危機覺醒到蒐集資訊、採取應對措施之過程中，尊皇勢力再度抬頭。鎖國體制是否持續維繫？「開國」是否利於日本未來在國際社會之生存？成為爭論的焦點。宕陰於鴉片戰爭後，以四年多的時間，完成《阿芙蓉彙聞》之編纂。內容計有卷一〈原始〉，論述鴉片戰爭起因在於明朝許可外國人居住澳門及與外國通商；卷二〈禁煙〉，收錄林則徐於廣東實施禁煙政策之十則相關文獻；卷三至卷五為〈交兵〉上、中、下，收錄《唐風說書》、《荷蘭風說書》記述鴉片戰爭具體經過之相關文獻並介紹世界地理；卷六〈懲惡〉，述及晚清官僚與民眾研討如何平定英亂之相關言論；卷七〈善後〉，收錄明清官僚論及海防之相關文獻十三則，目的在記取清廷戰敗的教訓，以防患於未然。[61]

《阿芙蓉彙聞》收錄中國文獻多達六十五則，大部分根據《唐風說書》、《荷蘭風說書》之內容編寫。鑑於其資訊未必真實，宕陰又取《皇朝經世文編》[62]以及幕末東傳日本之《夷匪犯境錄》[63]相關內容進行比對。惟收錄文獻多未能詳細註明其出處與來源。[64]

宕陰與齋藤竹堂(1815~1852)同為古賀侗庵之門人。竹堂曾編纂《鴉片始末》（1841）一書，記述鴉片戰爭起因，以至南京條約簽訂始末，主要根據古賀侗庵《鴉片釀片記》之內容寫成。竹堂贊成侗庵所提：「鴉

61 據〈阿芙蓉彙聞序〉，塩谷宕陰編纂時間起於弘化四年（1847），完稿於鴉片戰爭結束後四年餘。《阿芙蓉彙聞》計七卷，除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有抄本外，日本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圖書館、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筑波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均有藏本。參閱森睦彥，〈阿片戰爭情報としての唐風說書〉，《法政史学》第 20 號（1967，東京）。

62 《皇朝經世文編》是清代經世文編文類的開山之作。1825 年（道光五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1785~1848）聘請魏源入幕，代其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一書，並於翌年出版。書中收錄清初至道光三年期間之文章二千二百多篇，共 120 卷。

63 《夷匪犯境錄》作者不詳，據森睦彥的研究，該書於弘化年間（1844~1847）泊載進入日本，後由高鍋藩（今九州宮崎縣）藩校「明倫堂」於 1857 年（安政四年）翻刻而成。

64 有關《阿芙蓉彙聞》收錄之中國文獻，新村容子有詳細的考證。新村容子，〈《阿芙蓉彙聞》につい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40（2003，岡山），199~21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之事，曲在英國，直在清國」之論點，但認為清廷失敗主因在於墨守傳統「中華意識」。[65]宕陰讀《鴉片始末》後，云：

> 仙台齋藤馨子德據清商單報（《唐風說書》）、蘭人風聞記（《荷蘭風說書》）等以作此編。間有少誤，記事簡明，令人一覽，瞭數年之顛末，論尤切的中肯綮。[66]

認同侗庵、竹堂對清廷戰敗之看法，並將此書收錄於《阿芙蓉彙聞》卷五中。宕陰認為：「夫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華自高，不務索外蕃之情。」[67]指出英國知彼知己，清廷則以華自尊，導致失敗。佐久間象山亦曾於〈跋阿片始末〉（1845）一文中說：

> 當今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外寇；而戒備之要，莫先於知彼。苟能知彼，則我之所以備之者，自不能已矣。[68]

向齋藤竹堂力說「知己知彼」之重要性。

從《阿芙蓉彙聞》諸多自述中，處處可見宕陰嚴厲批判清廷墨守傳統華夷思想、妄尊自大、蔑視「洋夷」而招致慘敗之言論。其防患未然的思想，多來自中國之《易經》、《孫子兵法》等。〈阿芙蓉彙聞序〉中即述及：

> 履霜，堅冰至。《大易》繫諸坤之「初六」。至「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言陰之初生，不迨其未盛而制之。必且極為怪物，鼓風雷、起雲雨，雌雄相戰而灑血原野也。深哉其防微杜漸也。……嗚呼！棲諸夷於澳門者，滿清之履霜也。庚子之亂，其戰龍也。乃自我而觀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69]

---

65 齋藤竹堂，《鴉片始末》，收入鈴木省三編，《仙臺叢書》（宮城：仙臺叢書刊行會，1926），卷 10，頁 425~434。

66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宕陰存稿》，卷 5，頁 5。

67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序〉，《宕陰存稿》，卷 4，頁 6。

68 佐久間象山，〈跋阿片始末〉，收入信濃教育會編，《象山全集》（東京：尚文館，1913），上卷，頁 642。

69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序〉，《宕陰存稿》，卷 4，頁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宕陰引《易經》，意在呼籲日本必須未雨綢繆。此處稱西洋為「諸夷」、英國為「英夷」；於其〈六藝論〉中以「洋夷」稱西洋，並批評洋夷之貿易行為是「商賈盜賊」，帶有「日本型華夷觀」的色彩。宕陰認為清廷開放澳門，讓西洋勢力入侵中國，是造成滿清「履霜」之主因。「我之距清土纔一葦，而夷之涎已垂于東海矣。今則有不可不相病者焉。」[70]秉持自我警惕、防微杜漸的態度，表達同病相憐之情。擔憂「西海之烟氛」化為「東海之霜」，居安思危的心情表露無遺。

對於中國開放「洋夷」居住澳門，宕陰接著批評說：

> 今觀滿清鴉片之禍，其由不戒于履霜歟。蓋鴉片之禍，自澳門居西洋諸夷始。夫諸夷之居澳門，從明中葉，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時，洋夷來住者二千餘人。……於是乎夷漢雜居者餘二萬人。夫其數千萬之漢民，不為夷之服役，則為夷之接濟。不為夷之腹心，則為夷之耳目。夷以其精學利器、占天度、經地理、察風土、審情俗，乃至文學言語、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備虛實，莫不洞悉。[71]

在宕陰的認知中，「夷漢雜居」不但無法促進東西民族的融合，反而變成出賣民心、國情之毒瘤。新村容子指出：宕陰強烈批評「夷漢雜居」，對嚴禁與外國人接觸之「鎖國」體制給予高度評價。卻又以身為老中水野忠邦「側近」之有利條件，廣泛蒐集外國資訊，編纂成《阿芙蓉彙聞》，目的在貫徹「知己知彼」的主張，試圖呼籲周遭人士關注、瞭解西方世界之動向。如此作為，與幕府獨占且極力封鎖外國資訊之「鎖國」政策相牴觸，因而可視為是一位不自覺的「鎖國」體制批判者。[72]然而，宕陰視日本為「己」，日本以外者為「彼」，為了守「己」不予人知而主張「鎖國」，又為了盡力「知彼」、守「己」而蒐羅國外資訊。「夷漢雜居」僅會將「己」暴露於「彼」，給外人趁虛而入的機會，因此從廣義的角度而言，宕陰毋寧是一位鎖國論支持者。

---

70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序〉，《宕陰存稿》，卷4，頁6。
71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序〉，《宕陰存稿》，卷4，頁5。
72 新村容子，〈《阿芙蓉彙聞》について〉，2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外語學習及海防對策

西洋勢力逼近日本之際，遠在「西國」的薩摩、長州等藩，力倡攘夷，躍躍欲試。而支持鎖國論的宕陰認為幕府當務之急在於培育人才，於〈送井口孟篤序〉一文中述及：

> 方今遠西諸蕃，跋扈跳梁，包藏禍心，敵國外懼，近在眉睫，才之不可不育，以斯時為最急。若夫學為政源，教為治本，文武一致，禮兵同用，則孟篤平日所熟講而精究也。[73]

認為教育乃治國之本，「文武一致，禮兵同用」才是日本應走的方向。

宕陰、象山常引述《孫子兵法》之禦侮概念，建議運用於幕末的對外政策。前述〈阿芙蓉彙聞序〉中，宕陰批評清廷未能確實瞭解英國國情與其軍事戰力，認為「夷狄禽獸，心在貪貨，無他慮」、「夷陽為桀驁不順，外強而中乾」、「西洋去中國六七萬里，不必來寇」、「夷雖長火攻，中國有仁義節制之師」等既不知己、罔論知彼之錯誤認知，終究招致慘敗。[74]文中更諷刺清廷自詡：

> 彼客我主，我岸彼船，以逸待勞，奚能當我。而不知堅艘如山，漢奸如蠅，似勞實逸，雖客猶主也。[75]

將清人故步自封、以華自高、誤判外國情勢之愚昧醜態，描述得淋漓盡致。《孫子兵法》「知己知彼」之兵家常識，反自西洋各國獲得最佳印證。至於如何精準研判西洋情勢，宕陰於〈三語便覽引〉中有如下看法：

> 國家若有事於英，亦必有事於佛；有事於佛，亦必有事於英。方其時，蘭豈無如廓夷之於清者乎。則通此三邦之語者，亦邊備之要務，必不可闕也，且夫兵者知彼為要。……今之洋夷皆我敵也，欲審其情而不通其語，惡可。誚者默然，蓋棟梁之著此書，非專供邊防之

73 塩谷宕陰，〈送井口孟篤序〉，《宕陰存稿》，卷3，頁10。
74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序〉，《宕陰存稿》，卷4，頁5。
75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序〉，《宕陰存稿》，卷4，頁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用也。然在不解洋文如吾曹者，其為用猶如是其切，況於洋學專門之士乎。[76]

宕陰認為兵備、國防之要，首重暢通外語以便審視敵情、知彼知己而有所應對。象山於其《省譬錄》一書中亦指出：

> 馭夷俗者，莫如先知夷情。知夷情者，莫如先通夷語，故通夷語者不為惟知彼之階梯，亦是馭彼之先務也。予竊深念。[77]
>
>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孫子・謀攻篇》）固也。然知己知彼，在今時，未可言戰。悉善彼之所善，而不喪己之所能，然後始可以言戰。[78]

宕陰與象山都認為知己知彼的第一步就是要學習外語，以便汲取外國知識。象山更進一步分析，外語能力主要在於「善彼之所善」，同時知道自己具備多少能力之後方可言戰。而翻譯西書正是「善彼所善」之重要途徑。

四、佐久間象山的思想變遷

在德川社會吸收近代西洋文明的歷史脈絡中，佐久間象山之思想主張，如何加以定位？確實是極為複雜的問題。日本學界探討其思想變遷，大致可歸納出三種思考模式。一為丸山真男之論述，曰：

> 〔象山〕無論走到何處，均以朱子學的精神為媒介，走向學習歐洲自然科學之路，其過程突破涵蓋朱子學之漢學領域。這種「格物窮理」，與其說是歷史實體，不如視為在方法上的普遍真理。亦即象山將傳統朱子學的「格物窮理」思想，置於當時代的現況中，作最大限度的詮釋。換言之，象山認識西洋科學的方法，是在追求合理

76 塩谷宕陰，〈三語便覽引〉，《宕陰存稿》，卷 11，頁 9。

77 佐久間象山，《省譬錄》，259。

78 佐久間象山，《省譬錄》，2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實證的普遍性。[79]

丸山真男認為象山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理論特質，在於將世界與日本的認知帶往「國民化」（普及化）的方向走，主張對西方科學知識之認知及養成，不應局限於少數的蘭學者或政治家，必須普及於全體國民，才能使日本獨立於世界。[80]

內藤辰郎認為丸山真男將焦點置於象山信奉的封建儒學思想是否解體？是否已經接受了近代合理思想？[81]源了圓亦視象山之思想構造是朱子學崩壞過程的一種型態。[82]這個角度另有小池喜明作過分析。[83]

第二種視角是反對將象山擁有的儒學思想以「解體」的方式論述，強調必須回歸到象山如何以傳統儒學思想尋求近代西洋文明的受容來思考問題。例如，松田宏一郎即認為象山在與「西洋藝術」邂逅的過程中，其朱子學思想並未從道德領域中撤退，反而是因為對朱子學的正統解釋及其體系有充分的瞭解，才能有所執著，並跨出儒學範疇，而融合新領域的西洋文明。[84]植手通有則指出象山在吸收及評價西洋科學技術時，並未否定程朱學的格物窮理之理論，只是脫離其道學的傳統，重新詮釋近代科學之實證的、合理的方法，[85]並未以「道德」為東洋，「技術」

79 丸山真男，〈幕末における視座の変革——佐久間象山の場合〉，收入氏著，《忠誠と反逆》（東京：筑摩書店，1992），135；亦收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東京：岩波書店，1996），卷 9，226~227。

80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卷 9，211。

81 内藤辰郎，〈幕末儒学における佐久間象山の思想〉，收入衣笠安喜編，《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現在》（京都：思文閣，1995），189。

82 源了圓，《徳川合理思想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323。

83 小池喜明，〈幕末における「理」の変容——佐久間象山の場合〉、〈佐久間象山の物理と倫理——幕末における朱子学体系の崩壊〉，皆收入氏著，《攘夷と伝統》（東京：ぺりかん社，1982），75~97、98~115。

84 松田宏一郎，〈朱子学・正学・実学——佐久間象山試論〉，收入近代日本研究會編，《明治維新の革新と連続：政治・思想状況と社會経済》，列為《年報・近代日本研究》第 14 期（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21~23。

85 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近代思想の胎動——西洋観の転回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收入氏著，《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4），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西洋作切割，對儒教乃至格物窮理的普遍性秉持著信念，亦即格物窮理仍是象山作學問的基本與為學之要。[86]植手通有甚至將象山吸收「洋學」的過程，融入武士道精神的範疇加以論述。[87]宮城公子亦分析日本文明開化與儒教的主體性是有關連的，很難以「解體」作切割。[88]

第三個方向則是折衷性的論點。例如，本鄉隆盛從「信奉封建社會傳統為正統思想的象山，如何理解並接受與日本歷史發展結構完全不同的西洋文明及其世界觀」的角度進行考察。[89]此外，內藤辰郎也從象山的「易」學思想切入，探討象山的內心是否存在儒學與西洋科學是相異的世界觀之思維模式，強調重點必須置於當時日本整體的思想脈絡中加以思考。[90]

（一）「中體西用」與「東洋道德，西洋藝術」

晚清官吏孫家鼐（1827~1909）最早提出「中體西用」的論述，是在1894 年甲午戰後，[91]時間上足足晚了日本四十年。在象山思想的先行研究中，有不少學者將「中體西用」與「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思想主張相提並論。

平川祐弘認為日本真正脫離中國的「漢才」思想，是以十九世紀中

86 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近代思想の胎動〉，55~56。

87 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儒学・武士精神・洋学——横井小楠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收入佐藤昌介等著，《渡邊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系》第 55 冊（東京：岩波書店，1971），662~664。

88 宮城公子，〈日本の文明開化と儒教的主体〉，《日本史研究》第 295 號（1987，京都）。中譯本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243~277。

89 本鄉隆盛，〈佐久間象山——西洋受容の論理とパターン〉，收入《近代日本の思想》第 1 冊（東京：有斐閣，1997），105。

90 內藤辰郎，〈幕末儒学における佐久間象山の思想〉，《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現在》，189~208。

91 鄔國義，〈孫家鼐最早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第 2 期，總 18 期（長春），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葉培里叩關為起點，之後日本的目光逐漸轉向世界，關注「洋才」，其「和魂洋才」的風潮比中國的「中體西用論」有過之而無不及。平川氏也將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思想納入「和魂洋才」的原型作論述。[92]

本鄉隆盛認為象山的「東洋道德」之本質是「體」，「西洋藝術」則為「用」（作用），亦即「體用」的理論，將象山定位為洋學者或兵學者都是誤解。強調象山的思想主張都在儒學思想的框架內，並未脫離儒學者之界限。[93]

錢國紅從十九世紀中日知識分子對「西洋」認知的角度切入，視魏源為晚清「中體西用論」（洋務論）的鼻祖，將象山「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主張看作日本「和魂洋才論」的鼻祖，分析二人思想主張之異同，以瞭解中、日兩國文明開化過程的深層結構。錢氏分析魏源與象山對於東西洋價值觀的差異，在於魏源困惑於東洋（傳統）或西洋（文明科技）價值孰重孰輕，處於傳統與文明的對立及超越之間，而無法遂行傳統秩序改造的明確方向。象山最後以西洋文明價值為基礎，探索出符合日本現實面的新價值秩序。[94]

薛化元認為，象山「宇宙中實理無二，斯理之所在，天地無能異此，鬼神無能異此，百世聖人亦無能異此，近來西洋所發明的許多學術，要皆實理」，而「足以資吾之聖學（孔孟之學）」的論點，即與「中體西用」論者引進西用以衛中體的意味，根本上是相同的。[95]

此外，韓國的東洋史學者閔斗基，於〈中體西用論考〉中亦論及，晚清洋務派官吏薛福成（1838~1894）以西法為天下之「公理」而主張加以接受，此與象山以世界萬國的公理作為開國論的基礎，在態度上頗為

92 平川祐弘，《和魂洋才の系譜——内と外からの明治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1），10、23。

93 本鄉隆盛，《佐久間象山——西洋受容の論理とパターン》，104~105。

94 錢國紅，《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西洋」の発見——十九世紀日中知識人の世界像の形成》（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159~167。

95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臺北：弘文館，1987），2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似。[96]

小林寬則從宏觀的東亞視域，論述中國的「中體西用論」、朝鮮的「東道西器論」、日本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分析比較中、日、韓三國在受到西洋勢力衝擊後之思想變遷，文中亦探討象山的「格物窮理論」與西學的關係。[97]以下探討象山的儒教觀與世界觀之轉變。

（二）佐久間象山與《省僃錄》

1854 年，象山因門生吉田松陰（1830~1859）偷渡失敗而被牽連入獄，於獄中將構思多年之想法寫成《省僃錄》一書。根據象山的妹婿勝海舟（1823~1899）之序文內容，這份文稿一直由象山的後代保管，直到明治年間，才在勝海舟的協助下出版，公諸於世。序文中，勝海舟對象山之評價為性格開明而操之過急，這部文獻可以窺得象山在歷經幕末紛亂時代之思想主張。象山於《省僃錄》中自述，曰：

> 予年二十以後，乃知匹夫有繫一國。三十以後，乃知有繫天下。四十以後，乃知有繫五世界。[98]

可見其抱負是立足國家，放眼世界，自視甚高。於《象山全集》中，1842 年以前未見象山提及海防問題，其真正思考如何克服外來危機，是在受到鴉片戰爭衝擊，三十二歲以後的事。[99]亦即前述被真田幸貫任命為顧問後，才開始研究海外事務，當時箕作阮甫的《和蘭文典》正好出版，成為象山研習「蘭學」的入門西書。在此之前，象山視「程朱學」為「正學」，篤信儒家思想，因此尊重幕府之鎖國體制，贊同攘夷而非開國論之倡議者。當時象山對西洋人的看法是「一昧巧取利益，不辨仁義道德

96 閔斗基，〈中體西用論考〉，《東方學志》18（1978，漢城），167。

97 小林寬，〈東アジア近代思想研究——儒教の伝統と西洋の衝撃〉（筑波：筑波大學博士論文，1991）。

98 佐久間象山，《省僃錄》，271。

99 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儒学・武士精神・洋学〉，6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夷狄」，[100]這種觀念與塩谷宕陰視西洋人為「隨形器、謀富強，但求利益，不講道理」的看法相同。象山曾大言不慚的表示：「世界最優秀之人種為日本人，但若與外國文化相比，明顯弱點在於缺乏科學。」[101]不難看出其對西洋科學之重視。象山主張「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102]之務實思想，是在受吉田松陰牽連入獄，寫《省僇錄》時，提出「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的理念之一。[103]象山入獄後表明心迹，曰：

> 所行之道，可以自安。所得之事，可以自樂。罪之有無，在我而已。由外至者，豈足憂戚。若以忠信受譴為辱，則不義而富且貴，亦在其所榮耶。[104]

對於自己被判有罪，不以為然。對松陰欲出國瞭解西方世界而被捕下獄，更是抱不平。象山批評幕府之鎖國政策道：

> 禁止航海之鎖國令，為「最早死法」，至今卻仍堅守此令，愚蠢之至！美艦既已觸犯國法入港，令測量內海、兵員上岸，以兵力恐嚇，強求要地開港。盡忠祖國之忠臣良士，為探究彼國國力、國情，卻受縛入獄，此舉恰如作繭自縛。[105]

又批評幕府是：

> 缺點已被外國人看穿，卻仍墨守死法，不知汲取外國長處，不探察海外情勢，毫無氣概可言。[106]

---

100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東京：吉川弘文館，1959），140。

101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序文，頁 2。

102 佐久間象山，《省僇錄》，249。

103 佐久間象山於《省僇錄》提及：「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無鬩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怍於眾民，二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道，隨時安義，處險如夷，三樂也。生乎西人啟理窟之後，而知古聖賢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佐久間象山，《省僇錄》，249。

104 佐久間象山，《省僇錄》，243。

105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130。

106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1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象山是以儒者的立場，統合西洋科學之精神與技術，其核心價值即在精神方面保存傳統的價值理念（identity），在實用面上採用西洋文明的優點，「截長補短」是其主張「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基本理念。然而明治初期以後，日本社會充滿歐化思潮的功利主義現象，傳統的東洋道德理念在短期之間急速瓦解。

（三）佐久間象山的世界觀之形成

德川時代的鎖國思想，是為了禁壓新興町人（商、工）階級基於商業資本主義所主張之開國要求。德川中期的天文、地理學者西川如見（1648~1724）之《華夷通商考》、[107]以及荻生徂徠的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之《經濟錄拾遺》等，皆可得見此種思想表現。這種舊封建制度下之支配體制，即所謂「封建的鎖國攘夷論」，與幕末的尊王攘夷論（反幕府鎖國論）之範疇截然不同。[108]幕府之外交政策，由初期的鎖國體制，到幕末提出開國論的轉變，金子鷹之助指出源於下列四點因素：（1）俄、英、法、美等諸國強化對東洋的政治、經濟發展活動；（2）「蘭學」發達，促使世界知識入傳；（3）朱子學及國學興盛，促使尊王、國體觀念之再認知；（4）平民之經濟發展。[109]

天保年間，象山上書強調加強國防之必要性，並對幕府輕率的攘夷提出警訊，建議若要攘夷必須「知彼知己」，要「知彼」則必須蒐集情報、閱讀西書，雙管齊下方能見效，因此透過「蘭學」吸收新知是象山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幕府於 1842 年（天保十三年）7 月鴉片戰爭之後，廢止驅逐外國船隻的「文政打払令」，[110]同年 11 月發佈「天保薪水令」

107 西川如見之《華夷通商考》於元祿八年（1695）刊行二卷，寶永五年（1708）增補為五卷，內容記述中國、朝鮮、琉球、臺灣、印度、歐洲諸國之地理風俗、交通、產物，目的在訴求通商。

108 金子鷹之助，〈幕末に於ける開国攘夷論争と秋帆・象山の歷史的位置〉，6。

109 金子鷹之助，〈幕末に於ける開国攘夷論争と秋帆・象山の歷史的位置〉，6。

110 「文政打払令」是德川幕府為防止外國船員屢屢上岸及暴力行為，於文政三年（1825）頒佈之外國船追放令。又稱「異國船打払令」、「無二念打払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薪水給予令），對於來航的外國船隻提供燃料、糧食，改採柔軟路線。這些政策上的轉換，直接、間接受到高島秋帆及象山等人言論的影響。[111] 1848 年 11 月至 1850 年 3 月間，象山數度向松代藩建言，並上書老中阿部正弘，提議快速增刻荷蘭人商館長官 H. Doeff 出版之《增訂和蘭語彙》，以普及外語、蒐集外國情報，但均礙於「蘭書取締」之規定而未能實現。[112]象山感慨萬千，寫了一首詩，藉以諷刺無知的幕府及迂腐的儒輩，詩曰：

> 漢士與歐羅，於我俱殊域。皇國崇神教，取善自補翊。彼美故可參，其瑕何須匿。王道無偏黨，平平歸有極。咄哉陋儒子，無乃懷大惑。[113]

此外，象山請求幕府解除海外渡航之禁令，抒發警世良言，希望喚醒幕府狹隘的「天下」觀；又建議打造軍艦、大船及精緻武器，這些訴求同時可活絡貿易通商，提升經濟效益。1853 年培里叩關時，象山奉命前往浦賀港觀察美國艦隊之動靜，曾提出「急務十條」的海防論，向老中阿部正弘獻策。之後，專心關注國防問題，從鎖國論的支持者轉變為尊王開國論者，其思想轉變與金子氏指出的四大因素均有關連。德川吉宗解除蕃書禁令之後，藉由青木昆陽（1698~1769）、前野良澤（1723~1803）、杉田玄白（1733~1817）、大槻玄澤（1757~1827）、渡邊崋山、高野長英等人之努力，蘭學得以蓬勃發展。同時，荷田春滿（1669~1736）、賀茂真淵（1697~1769）、本居宣長（1730~1801）等人復興國學（日本學）；柴野栗山（1736~1807）、古賀精里（1750~1817）、賴山陽等人普及朱子學而彰顯勤王思想乃至國家觀念，亦是促使幕府選擇開國論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114]

對幕府而言，1856 年（安政三年），無論在內政或外交都是慌亂的

111 金子鷹之助，〈幕末に於ける開国攘夷論争と秋帆・象山の歴史的位置〉，29。
112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90~91。
113 宮本仲，《佐久間象山》，178。
114 金子鷹之助，〈幕末に於ける開国攘夷論争と秋帆・象山の歴史的位置〉，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年。內政方面，因將軍繼任問題引發幕府高層的政爭；外交方面，為汲取西洋知識及抵禦外侮，相繼於 2 月成立「蕃書調所」，4 月開設「講武所」，但在長崎「海軍傳習所」接受訓練的學生因素質欠佳，轉而派遣學生赴海外留學，只可惜臨難鑄兵，為時已晚。7 月，美國總領事 Townsend Harris（1804~1878）帶著美國總統的信函，於下田港（今靜岡縣，伊豆半島東南端）上岸，要求禮遇並短期居留日本。主要是 1854 年 3 月，培理與幕府大學頭林煌簽訂「日米和親條約」後，雙方在派遣外交官的認知上有所差異。當時雙方分別持有英文、日文、荷蘭文及中文版的條約，內容明訂「簽約國一方認為必要時，即可派遣外交官」，但德川幕府卻解讀為「兩國政府認為必要時，方可派遣外交官」。因此，日本對 Townsend Harris 突然造訪，要求締結新的通商條款感到錯愕。Townsend Harris 則以擁有美國總統的全權委任狀為由，希望比照歐洲國際慣例，要求直接將委任狀遞交日本「元首」，遂在當年 10 月 21 日晉見了幕府第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1824~1858）。[115]在這段外交折衝過程中，幕府陷於朝廷強硬派的尊王攘夷論及與美國的約定之間，進退兩難。翌年 6 月，幕府授權大老井伊直弼（1815~1860）私下與 Townsend Harris 簽訂「安政假條約」，條約中雖然關閉了下田，卻開放函館、長崎、兵庫（神戶）、神奈川、新潟等五口通商，同時荷、英、俄、法等國可比照辦理。至此，日本已經形同「開國」，遂引發朝廷公卿、下級武士等尊王攘夷論者的反彈，掀起了倒幕運動。

此時象山仍在松代藩「蟄居」中，對於英國強行將鴉片輸入中國、美國強制要求日本通商等作為，認為都是圖謀私利，不仁、不慈、無禮、無義之強盜行徑，非實踐西洋諸國「公共道理」應有之態度。眼見幕府軟弱、屈辱的外交對策，象山嚴批「蕃書調所」功效不彰，上萬言書給主張門戶開放之川路聖謨及「海防掛」的岩瀨忠震，並請「尊攘詩人」梁川星巖（1789~1858）出面斡旋，[116]建議幕府應儘速遣使赴美交涉，一

115 川崎庸之等監修，《読める年表》（東京：自由國民社，1991），780。

116 梁川星巖素有「尊攘詩人」之稱，天保八年（1837）陽明學者大塩平八郎（1739~18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蒐集國情，一則打開以「公共道理」交涉外交事務之生路。象山堅持與外國談判必須是自主性的對等外交，反對屈於恐嚇而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幕府對美國退讓後，荷蘭於同年 8 月、俄國於 9 月，分別與日方簽訂了追加條約，幕府之外交折衝，節節敗退，政權岌岌可危。對於幕府如此軟弱無能，象山批評曰：

> 去歲浦賀應接，護衛無法，夷虜嗤之，邦人恥之，而不少省悟。今又為此兒戲，官吏不肖，固不足道。本藩武功盛名，為此輩壞隳，豈可忍邪。[117]

當外國勢力不斷逼近日本，象山發現堅守傳統儒教之普世價值，無法完成「攘夷」任務，對「鎖國」不符合未來國家發展有所覺醒，進而質疑曰：

> 本朝神聖造國之道，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兼明而默識之乎？禮樂刑政，典章制度，以至兵法、師律、械器之利，講論而皆得其要乎？土境之形勢，海陸道路之險夷，外蕃之情狀，防戍之利害，城堡堵堞控援之略，推算重力幾何詳證之術，並究而悉之乎？吾未知之也，然則今之所謂儒者，果何為者耶。[118]

象山之學問主張以「窮理」與實用為至要，此時對儒者講論禮樂刑政、典章制度，甚至兵法、師律、械器之利，是否得其要領表示質疑；更憂心外國情勢、國防問題及其他相關科學技術能否達到「名物器數之窮理」。因此，決定修習「蘭學」，以閱讀西洋書籍作為瞭解世界之跳板；在應用層面上，認為必須導入西洋科技，才能厚植國力。正所謂「四十以後，乃知有繫五世界」之心境寫照。此時象山不斷閱讀西書，逐漸瞭

舉兵批判幕府政策之際，佐久間象山即與梁川星巖往來，橫井小楠與吉田松陰亦經常就攘夷、開國之事向星巖請教。梁川星巖於〈讀魏默深海國圖志〉中，有一首七言絕句，詩曰：「百事拋來只懶眠，衰躬迫及鋪糜年。忽然摩眼起快讀，落手邵陵籌海篇。」表達對魏源描述西洋世界知識之重視。梁川星巖，《梁川星巖全集》（東京：梁川星巖全集刊行會，1957），卷 2，105。

117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62~263。

118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解外國的制度文物遠遠超越日本，終於放棄原本視外國為「夷狄」、「黠虜」之偏見。「夷狄」、「黠虜」是對毫無德義、廉恥心之野蠻人的蔑稱。1862 年（文久二年），象山向幕府提出之上書稿中曾提及：「若現在仍稱呼朝鮮、琉球為夷狄，彼等雖為小國，必不甘心接受，何況對東西洋的大國稱之為夷狄或蔑視之，則本人認為日本是為無禮之國。」[119]象山又說：「先前來航之西洋人皆為文化發達、知書達禮者，應以外蕃或外國人稱之。」[120]象山逐漸認知到日本與外國交涉的態度必須提升到國與國的關係上來處理，才能突破傳統而有所建樹。在致梁川星巖的書簡中亦言及：「今時外蕃……學術技藝遠超越漢土，古聖賢未能發明之事，皆已發明。」[121]象山從忽視、敵對的態度，轉而肯定西洋文化之發達、器物之精進，非東方國家可以比擬；進而認為日本必須拋開「日本型的華夷觀」，不能再坐井觀天，應該向西方學習，走入國際世界。近代國家之平等概念在日本逐漸浮現，這也是象山主張「開國論」的轉捩點。換言之，幕府在認清自我的「天下」觀之外，還有無數強而有力的西洋世界，而不得不放棄鎖國政策，象山即是扮演傳遞這項訊息的角色。丸山真男將象山的這種思想轉變，定義為從儒教的「中華」對「夷狄」觀，過渡到近代的國家平等論，是一種非二選一的「都合（現實）主義（realism）」，也是象山思想態度發展的一種「典型」。[122]

五、日本走向世界的起點

鴉片戰爭的危機，是幕府重新認識中國，放大視野、走向世界的起

119 佐久間象山，〈時政に関する幕府宛上書稿〉，文久二年（1862）9 月，收入佐藤昌介等著，《渡邊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內》，315。

120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141~142。

121 佐久間象山，「梁川星巖に贈る」書簡。見高島秋帆、佐久間象山著，金子鷹之助解題，《高島秋帆集・佐久間象山集》，240。

12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卷 9，233~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日本學界關注此一焦點的廣度及深度，從岩下哲典〈アヘン戦争情報の伝達と受容〉一文可得見諸多先行研究之論述。[123]古賀侗庵涉獵了諸多朱熹的學說，特別是以「變通」的理論及「窮理」觀作為其「海防策」之思想主張，這些主張多方反映在其對幕末外交政策的建言中。[124]侗庵編輯之《鴉片釀變記》（1841），是德川幕末最早記述鴉片戰爭情報的「風說書」，內容主要批評英國侵略中國，以及中國自大、不願接受西洋科技之不當，其主張影響了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又前述《宕陰存稿》隨處可見宕陰嚴厲批評英國行徑及中國應對之不當，其思想主張亦明顯受到侗庵之影響。象山曾於〈跋阿片始末〉一文中，向齋藤竹堂力說「知己知彼」之重要性。[125]松陰也是讀了宕陰《阿芙蓉彙聞》的〈抗英鬥爭檄文〉（卷六），產生共鳴後，才倡議「草莽崛起論」。[126]三谷博指出，德川幕末的鴉片戰爭危機觀，肇始於侗庵，侗庵是幕末知識人中改變中國觀及西洋觀的鼻祖。[127]從齋藤竹堂的《鴉片始末》（1843）、[128]箕作阮甫的《和蘭文典》（1842）、《新製輿地全圖》（1844）、箕作省吾的《坤輿圖識》（1845）、塩谷宕陰的《阿芙蓉彙聞》（1847~1851）與《隔靴論》（1857）、佐久間象山的《省譽錄》（1854）等一脈相承、因應危機之對外關係文獻內容，可窺知三人皆從全面信奉儒學思想，到否定不合時宜的空洞學理；從蔑視「洋夷」，到認同、汲取、應用西洋文明科技，發揮了顛覆傳統、認識新知的引導作用。箕作阮甫重新詮釋了世界地理知識，塩谷宕陰及佐久間象山也透過儒學與「蘭學」的知識吸收與

123 岩下哲典，〈アヘン戦争情報の伝達と受容——天保 10 年から 13 年まで〉，29~30。

124 眞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291~297。

125 佐久間象山，〈跋阿片始末〉，《象山全集》，上卷，642。

126 吉田松陰致北山安世書簡（安政六年〔1859〕四月七日），收入吉田松陰著，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86 復刻版），第 6 卷，頁 278。

127 三谷博，〈文久幕制改革の政治過程〉，收入近代日本研究會編，《幕末・維新の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81），89~128。

128 齋藤竹堂《鴉片始末》係根據荷蘭及中國船隻提供的「風說書」編輯而成。詳請參閱藤田彰一，〈阿蘭陀別段風説書の漏洩〉，《洋学史研究》第 4 號（1987，東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較，改變了思想主張。換言之，他們因對傳統華夷觀念的轉變而引導出新的世界觀，進而接受西洋文明科技，訴求確保日本的獨立並提升其國際地位，是經過摸索、試驗、體認，循序漸進而形成主張開國之思想體系。

（一）醫學者、儒學者的開國論

對德川幕府而言，從鴉片戰爭到培理叩關，約十五年的時間，是日本外交處境最艱難的時代，無論是接觸西洋醫術的「蘭醫」，或幕府昌平黌的儒者、地方藩士，紛紛反對攘夷而倡議「開國」。箕作阮甫「醫而優則仕」，參與幕政有較大的揮灑空間，影響力及於外交政策。塩谷宕陰的思想主張，促使幕末諸多儒者對中國觀念產生變化。佐久間象山更是以一介藩士，立足於正統的朱子學思想，從「實理」、「實用」、「有益無損」的角度，努力將西洋文明普及於日本社會。三人都受到鎖國體制的規範，無法出國親身體驗西洋文明，卻是忠貞愛國的思想啟蒙者，他們的思想主張在幕末明治期的文明開化過程中，所具意義詳見後述。

（二）同為「東西學術究古今」的推動者

箕作阮甫普及世界地理知識，推動「蘭學」往幕府的官學化發展，並非與傳統儒教互別苗頭，其目的在探索西洋文明，確保日本獨立自主。阮甫雖然生活困頓，但胸懷大志，自我期許甚高，不願汲汲惶惶只求溫飽，故捨棄醫業，致力於西書翻譯，認為：

> 目前看似無所助益，實則趁世間沈睡未醒時，專研有益國家之學問。一時家計貧困微不足道，倘能名揚西洋則心滿意足矣。[129]

阮甫接觸西洋醫學過程中，得知實證、科學方法論之優點，進而成為其由「漢醫」轉向「蘭醫」，由「蘭醫」轉為「蘭學家」之重要根據。阮

129 玉木存，《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甫認為東洋之道德思想仍是其精神支柱，與學習西洋並不矛盾，其目標不在於西洋之思考方式或社會制度，而是足以與東洋精神映照之科學技術，此從其「身生東海，奮如讀歐羅巴之書。道慕西洋，竦然奉如德亞之學」之心境，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印證。[130] 阮甫在 1853 至 1854 年間翻譯美、俄外交文書之後，曾寫了一首詩，曰：「春霖和淚濺茅廬，每使雄心殘莫餘，記得司天臺外路，不辭風雨問西書。」[131]反映了他對西方列強入侵日本的不滿情緒及其吸收西洋新知的決心。透過西書日譯，阮甫不但成為傳播西方文明的啟蒙思想家，也成為幕府對俄外交談判的關鍵人物，實現了「有益國家」、「名揚西洋」的願望。

1863 年（文久三年），阮甫臨終前寫了一首詩，詩曰：「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儘鉤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132]顯示他不分東西古今的治學理念。

塩谷宕陰大力提倡吸收西洋文明的過程中，幾乎不見對傳統儒學思想作過嚴厲批判，其思想主張是以傳統儒教理論為基礎，兼顧西洋文明科技之應用的折衷思想，其思維模式潛藏著佐久間象山後來提議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之精神。

基本上，佐久間象山不反對十七世紀的鎖國政策，但反對幕府到了十九世紀仍死守鎖國祖法，深陷開國與否及保衛主權之漩渦，遲遲無法跳脫自我，不能以宏觀的視野看日本、看世界。1857 年（安政四年），象山於〈題孔子像贊〉中提及：

> 人謂泰西之學盛，孔子之教必衰。予謂泰西之學行，孔子之教滋得其資。夫泰西之學藝術也，孔子之教道德也。道德譬則食也，藝術譬則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氣，孰謂可以菜肉，而損其味耶。[133]

130 吳秀三，《箕作阮甫》，106。

131 吳秀三，《箕作阮甫》，47。

132 緒方富雄，〈蘭学者箕作阮甫の人と学〉，收入蘭学資料研究会編，《箕作阮甫の研究》，52~53。

133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5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認為西學、孔教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無排他性。然而，鴉片戰爭、美國勢力入侵之經驗顯示：日本若無法維持與西洋各國勢均力敵的態勢，儒學道德理教並不能化解外來危機。故而主張藝術（技術）與道德兼備，以求國家永續生存，是一種截長補短的折衷理論。

象山上書與幕府高層溝通，依賴的關鍵人物即是曾與箕作阮甫並肩對俄談判的川路聖謨，象山稱之為「司農」。1841 年，真田幸貫就任幕府老中之際，象山、聖謨二人曾就政見交換意見。聖謨於 1843 年隨佐藤一齋（1772~1859）修習陽明學，與象山學朱子學。[134]此時老中水野忠邦因「天保改革」失敗而下台。聖謨入幕府為官後，不拘學派論述，廣納各方學說與建議，除儒學、兵學外，更積極涉獵海外知識，成為日後幕府外交折衝之舵手。1852 年（嘉永五年）9 月，培理叩關前，聖謨由大阪赴江戶升任幕府勘定奉行時，曾詢問象山有關海防之事。象山於《省譽錄》中回憶說：

> 因出擬上書舊稿，示之，極言近都防堵修築無法，不適實用，司農亦未甚信之。及墨夷（美國）事興，無一不如予嘗所論，於是始深納予言。一日謂予曰：「子欲有所言，吾能達之於閣老。」為君傾倒幾盡，君能言之，君能行之，天下之福也。僕但求天下之福耳，上書釣名，非其本心也。[135]

聖謨對於象山預測海防政策，由懷疑到信任，象山之建言看似可以上達幕府高層，發揮作用，但其實不然。象山記載此事經過：

> 及論選人材、購船於海外之策，司農有沮色。予曰：「是當今先務之急，而君猶牽掣故常，不能發言，他尚何望，僕當上書以道之。」乃條疏急務十事，因司農上之阿部閣老，不報。[136]

象山以「急務十事」，力倡整頓國防，以達成攘夷之目的，此建言經由聖謨上呈老中阿部正弘，並未獲得認同。

---

134 川田真夫，《川路聖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50~51。

135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68。

136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門生吉田松陰因違反鎖國規定而入獄，象山曾忿忿不平的表示：

> 故常之不易變，時勢之不可明，如此，不知天下之大計，將何日而能立也。[137]

憂心幕府死守鎖國祖法，日本將被孤立，而無法立足於國際社會，此為象山轉向開國論的原因之一。

象山無論對攘夷論的批判或主張開國的思想，都具有先見之明，為何六度上書，[138]屢遭松代藩及幕府拒絕？關鍵在於象山過度強調外在危機及強化海防、軍事等技術層面，極力推銷救國理念，卻忽略國內朝廷、幕府及地方藩侯間存在著複雜的政治盤算與利益糾葛，缺乏一致對外的共同理念。象山曾於獄中述曰：

> 人所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人所不及能，而我獨能之，是亦荷天之寵也。荷天之寵如此，而惟為一身計，不為天下計，則其負天也，豈不亦大乎。[139]

這種自認為天將降大任於己之狂妄個性，亦是推動改革不利的因素。

中山茂指出，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在擴展世界新視野的同時，潛在意識中也認為實用性的西洋科學技術優於傳統的東方學術。[140]在致力解除幕末外在危機之際，箕作阮甫、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三人皆將潛在意識轉為實際行動，以汲取西方知識為手段，達到「知彼」之目的，強調「應用重於理論」，並提出策略，嘗試改變日本朝野舊有的天下觀，扭轉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以促使日本及早因應複雜的國際社會，影響了德川幕末從攘夷轉向開國的對外政策。

---

137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68。

138 岡田袈裟男，〈佐久間象山とアヘン戦後の東アジアを生きる気分——省譽録と蘭学文学史〉，《日本文学》第 42 巻第 1 號（1993，東京），18。

139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245。

140 中山茂，《近世日本の科学思想》，209~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理念傳承，後繼有人

箕作阮甫的後代，人才輩出。箕作秋坪（1826~1886）為阮甫的贅婿，幼年入緒方洪庵（1810~1863）之「適塾（緒方塾）」學蘭學，後於幕府天文臺從事翻譯，並擔任「蕃書調所」助教。1861 年隨福澤諭吉等人遊歐，1866 年奉派赴俄交涉樺太（庫頁島）國境事務。明治維新後，於東京開設「三叉學舍」，1873 年，「明六社」成立時，擔任社長並兼任教育博物館及東京圖書館長。秋坪之三男箕作佳吉為日本近代動物學之創始者，四男箕作元八為優秀的西洋歷史學家。另，箕作麟祥為阮甫之孫、省吾之子，撰有日本最早論述三權分立制度及歐洲憲法之著作，為明治政府編纂法典之重要學者。麟祥早年以幕臣身分留學法國，歸國後致力於日本的近代法，特別是民法之編纂，也參加「明六社」的學術活動。歷任元老院議員、司法次官、貴族院議員、行政裁判所長官、「和仏法律學校」（法政大學前身）校長。箕作阮甫的後代普及西學於日本，奠定明治時期諸多近代科學之基礎，一脈相承，貢獻卓著。

塩谷宕陰的得意門生中村正直（敬宇，1832~1891），為「明六社」成員、貴族院議員，並任東京大學教授，講授漢學。中村正直繼承宕陰衣缽，翻譯《西國立志編》、《自由之理》等西書，將西方世界的民主思潮東傳日本，並倡議外來宗教必要說，影響明治社會極為深遠。[141]

實證主義論者津田真道（1829~1903），1850 年隨箕作阮甫修「蘭學」，與象山學西洋兵學，1857 年任蕃書調所助教。自荷蘭學成歸國後，以「富國強兵」為政治目標，設定「三大急務」：（1）為維持國家獨立，主張改革兵制；（2）為提昇國民知識水平，應設立學校普及教育；（3）為使經濟發展，須擴大造船及運輸事業，以邁向資本主義化社會。[142] 1868 年，津田將留學時的「國法學」講義筆記譯成《泰西國法論》一書出版，

141 有關中村正直對於日本漢學教育及外來宗教之思想主張，請參考：筆者，〈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4 期（2006，臺北），140~153。

142 山田芳則，〈津田真道——陽明学より唯物論・弱肉強食の社会進化論・利己主義へ〉，收入氏著，《幕末・明治期の儒学思想の変遷》（京都：思文閣，1996），91~92。

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析西洋法律思想與政治制度理論，提出日本國家新體制的「聯邦制度」，以及設置上、下兩院等構想。真道早期尊崇陽明學，到歐洲求學後逐漸遠離佛學、朱子學、陽明學的虛學理論，轉而提倡實證主義之實學理論，積極推展文明開化、社會進化及利己主義等訴求。[143]

此外，漢學家三島中洲（1830~1919）的思想主張與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也有共同焦點。中洲先學朱子學，後批評朱熹、王陽明的解經，從伊藤仁齋、荻生徂徠到明、清考證之學，博覽群書、兼通諸學後，轉而信奉折衷學。中年之後，有感學問與現實差距，經其師山田方谷（1805~1877）開導，改採以實用為主的道學而成為陽明學者。[144]培理叩關之際，中洲與佐久間象山的作法一致，全神關注美艦動向，不但詳記艦長姓名、乘組員的服裝、人數、武器配備及搭載大砲的數量，更記錄各藩守備區域及幕府與美國交涉經過，拜訪塩谷宕陰完成最後雙方講和內容之紀錄後，輯成《探邊日錄》一書，[145]這篇紀錄成為中洲對外關係論的思想起點。中洲雖受教於佐藤一齋、安積艮齋，但其思想的轉變也受到安井息軒、塩谷宕陰之影響。中洲的對外關係論主要訴求為「交易策」，主張日本應站在主攻立場，提議幕府應出鉅資、造巨艦作為示範。商人若造巨艦，則由幕府提供貸款，收取十分之一稅金，稅金累積後再用於造艦及購買外貨，交易應始於中國、印度而擴及於西洋諸國。[146]三島中洲詳細剖析美國入侵日本之資訊，即是延續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主張「知己知彼」的一貫立場，而其「交易策」的主張近似佐久間象山以貿易通商之經濟利益為根據的平民開國論。這些思想的萌芽，對德川幕末推動文明開化的腳步有相當程度之影響。有關津田真道及三島中洲之思想比較，將另稿論述。

---

143 山田芳則，〈津田真道——陽明学より唯物論・弱肉強食の社会進化論・利己主義へ〉，96、104。

144 三島中洲，《中洲文稿》（東京：三島毅，1899），第2集，自序。

145 三島中洲，《探邊日錄》，《二松学友會誌》第23輯（1914，東京）。

146 山田芳則，〈津田真道——陽明学より唯物論・弱肉強食の社会進化論・利己主義へ〉，107~10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結論

十九世紀西力東漸後，掀起東亞國際秩序重整風暴，從鴉片戰爭到培理叩關，帶給德川幕末強烈的危機意識，而主導幕府危機處理的領導階層為老中水野忠邦、阿部正弘及勘定奉行川路聖謨，渠等與箕作阮甫、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均有深厚的淵源。箕作阮甫出身於岡山津山藩，塩谷宕陰活躍於江戶，佐久間象山則為信州松代藩士，三人都受過儒教思想的薰陶，雖來自不同的領地，但西洋勢力入侵東亞之際，皆是德川幕末率先感受到危機意識的知識人。在接受西洋思想的過程中，三人皆脫離傳統儒教思想的窠臼，過濾出折衷理論，以實用兼備的務實態度，吸收西方文明。箕作等三人在思考日本文明開化的複雜問題時，原則上從德川時代主流的儒教思想出發，但在外力逼近之時代背景下，傳統的「華夷」、「天下」觀有了轉變，不但重新審視對中國的認知，也積極思考以多元模式汲取西洋文明科技，嘗試從動亂的國際社會秩序中，尋求日本之主權獨立與平等。本文如各節所述，從思想變遷的角度切入，探討三人思想脈絡之「異」與「同」，三人各憑其學識，挑戰德川幕府不合時宜的體制，孕育優秀人才，影響幕末維新期的社會大眾，對日本的文明開化作出貢獻。

*本文曾宣讀於「東亞世界中日本社會的特徵」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7 年 3 月）。承蒙各位審查人寶貴意見及指正，獲益良多，敬表謝意。

（責任編輯：田上智宜　校對：劉育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合眾國書翰和解（1852 年 11 月 13 日）」，《史料に見る日本の近代》。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木村岩治編，《箕作阮甫・西征紀行》。津山：津山洋學史料館友の会，1991。

吉田松陰著，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86 復刻版。

佐久間象山，〈時政に関する幕府宛上書稿〉，收入佐藤昌介等著，《渡邊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系》第 55 冊。東京：岩波書店，1971。

佐久間象山著，信濃教育會編，《象山全集》。東京：尚文館，1913。

佐久間象山，《省譽錄》，收入宮本仲，《佐久間象山》。東京：岩波書店，1932。

佐久間象山著，信濃教育會編，《增訂象山全集》。長野：信濃每日新聞社，1934。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10~1926。

高島秋帆、佐久間象山著，金子鷹之助解題，《高島秋帆集・佐久間象山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6。

新井白石，《西洋紀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新井白石著，大槻文彥校，《采覽異言》。白石社：明治 14 年（1881）。日本神戶大學「住田文庫」藏本。

塩谷宕陰，《阿芙蓉彙聞》。日本九州大學藏本。

塩谷宕陰，《宕陰存稿》。東京：山城屋政吉，1870。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

塩谷宕陰，《籌海私議》。日本北海道大學藏本。

箕作阮甫，《八紘通誌》，6 卷。須原屋伊八刊行，嘉永 4 年（1851）～安政 3 年（1856）。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

箕作阮甫、箕作省吾，《新製輿地全圖》。日本神戶大學「住田文庫」藏本。

箕作阮甫等譯，《海上砲術全書》，嘉永 7 年（1854）。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

箕作省吾，《坤輿圖識》。江都：岡田屋嘉七等，弘化 2 年~3 年（1845~1846），7 冊。日本神戶大學「住田文庫」藏本。

二、中文論著

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64 期，2006，臺北。

閔斗基，〈中體西用論考〉，《東方學志》，18，1978，漢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鄔國義，〈孫家鼐最早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第 2 期，總 18 期，長春。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臺北：弘文館，1987。

三、日文論著

三谷博，〈「アジア」概念の受容と変容——地理学から地政学へ〉，收入渡邊浩、朴忠錫編，《韓国・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変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5。
三島中洲，《探邊日錄》，《二松学友會誌》，第 23 輯，1914，東京。
三島中洲，《中洲文稿》，第 2 集。東京：三島毅，1899。
丸山真男，〈幕末における視座の変革——佐久間象山の場合〉，收入氏著，《忠誠と反逆》。東京：筑摩書店，1992。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卷 9。東京：岩波書店，1996。
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小池喜明，〈佐久間象山の物理と倫理：幕末における朱子学体系の崩壊〉，收入氏著，《攘夷と伝統》。東京：ぺりかん社，1982。
小池喜明，〈幕末における「理」の変容：佐久間象山の場合〉，收入氏著，《攘夷と伝統》。東京：ぺりかん社，1982。
小林寬，〈東アジア近代思想研究——儒教の伝統と西洋の衝撃〉。筑波：筑波大學博士論文，1991。
山田芳則，〈津田真道：陽明学より唯物論・弱肉強食の社会進化論・利己主義へ〉，收入氏著，《幕末・明治期の儒学思想の変遷》。京都：思文閣，1996。
川田真夫，《川路聖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川崎庸之等監修，《読める年表》。東京：自由國民社，1991。
川路寬堂編述，《川路聖謨之生涯》，收入大塚武松、藤井甚太郎編，《川路聖謨文書》。東京：日本史籍協會，1970 覆刻吉川弘文館 1903（明治 36 年）初刊本。
中山茂，《近世日本の科学思想》。東京：講談社，1993。
内藤辰郎，〈幕末にける佐久間象山の思想〉，收入衣笠安喜編，《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現在》。京都：思文閣，1995。
平川祐弘，《和魂洋才の系譜：内と外からの明治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1。
本郷隆盛，《佐久間象山——西洋受容の論理とパターン》，收入《近代日本の思想》第 1 冊。東京：有斐閣，1997。
玉木存，《開国——箕作阮甫と川路聖謨》。東京：創林社，1983。
石山洋，〈箕作阮甫の海外知識〉，收入洋学史学会編，《洋学史学会研究年報・洋學 2・特集・箕作阮甫》。東京：八坂書房，19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伊東多三郎，〈禁書の研究〉，《歷史地理》，第 68 卷第 4 號。1936，東京。
佐久間象山，《省僃錄》，收入宮本仲，《佐久間象山》。東京：岩波書店，1932。
佐藤昌介，《洋学史論考》。京都：思文閣，1993。
吳秀三，《箕作阮甫》。東京：大日本圖書，1914。京都：同朋社，1973 復刻。
岡田袈裟男，〈佐久間象山とアヘン戦後の東アジアを生きる気分：省僃録と蘭学文学史〉，《日本文学》，第 42 卷第 1 號，1993，東京。
岩下哲典，〈アヘン戦争情報の伝達と受容——天保 10 年から 13 年まで〉，收入明治維新史学会編，《明治維新と西洋国際社会》，《明治維新研究史》第 5 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岩田高明，〈箕作阮甫訳述『八紘通誌』の西洋教育情報——近代日本教育制度の形成過程の基礎研究〉，收入安田女子大学編，《安田女子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開設記念論文集》。廣島：安田女子大學，1997。
松田宏一郎，〈朱子学・正学・実学——佐久間象山試論〉，收入近代日本研究會編，《明治維新の革新と連続：政治・思想状況と社會経済》，《年報・近代日本研究》第 14 期。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
松田隆行，〈弘化・嘉永期における異国船取り扱方と打払令復活問題——阿部政権期の江戸内海防衛策をめぐって〉，收入明治維新史学会編，《明治維新と西洋国際社会》，《明治維新研究史》第 5 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金子鷹之助，〈幕末に於ける開国攘夷論争と秋帆・象山の歴史的位置〉，收入高島秋帆、佐久間象山，金子鷹之助解題，《高島秋帆集・佐久間象山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6。
宮本仲，《佐久間象山》。東京：岩波書店，1932。
宮城公子，〈日本の文明開化と儒教的主体〉，《日本史研究》，第 295 號，1987，京都。中譯本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高増杰，〈西欧的世界観の受容と改造〉，收入西洋思想受容研究會，《西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福沢諭吉からジョン・ロールズまで》。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2。
徐興慶，《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
眞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
梁川星巖，〈讀魏默深海國圖志〉，《梁川星巖全集》，卷 2。東京：梁川星巖全集刊行會，1957。
森睦彦，〈阿片戦争情報としての唐風説書〉，《法政史学》，第 20 號，1967，東京。
森睦彦，〈《海國圖志》の舶載から翻刻まで〉，蘭學資料研究會，《研究報告》，第 206 號，1968，東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近代思想の胎動：西洋観の転回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收入氏著，《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4。
植手通有，〈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儒学・武士精神・洋学——横井小楠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收入佐藤昌介等著，《渡邊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第 55 冊。東京：岩波書店，1971。
菊池俊彥，〈箕作阮甫の自然科学〉，收入蘭學資料研究會編，《箕作阮甫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78。
菊池俊彥，《箕作阮甫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78。
新村容子，〈《阿芙蓉彙聞》について〉，《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40 期，2003，岡山。
源了圓，《徳川合理思想の系譜》。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
源了圓，〈幕末における中国を通しての「西洋学習」：《海国図志》の受容を中心として〉，第 3 卷，「思想」，收入源了圓、嚴紹璗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
箕作阮甫，《西征紀行》，收入菊池俊彥，《箕作阮甫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78。
鮎澤信太郎、大久保利謙著，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編，《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東京：乾元社，1953。
錢國紅，《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西洋」の発見：十九世紀日中知識人の世界像の形成》。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
齋藤竹堂，《鴉片始末》，收入鈴木省三編，《仙臺叢書》，卷 10。宮城：仙臺叢書刊行會，1926。
藤田彰一，〈阿蘭陀別段風説書の漏洩〉，《洋学史研究》，第 4 號，1987，東京。
蘭學資料研究會編，《箕作阮甫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Japan Intellectuals who Absorbe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Late Tokugawa Period

Shyu, Shing-ching*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Bakumatsu-Ishin era when the Great Powers approached, the 'Rangaku' trend prevailed, attempting to absorb some of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e. The Hanshi offspring strove to master the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gunnery for the national defense preparation. At that time, Banshoshirabesho (the antece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engaged the service of Rangaku scholars with rich western knowledg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higher levels of faculty. Mitsukuri Genpo (1799~1863), Shionoya Touin (1806~1867) and Sakuma Shouzan (1811~1864) studied both Confucianism and 'Rangaku' and generated high crisis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Great Powers invading Japan as well. Their ideologies catalyzed and evolved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modernization in Japan.

Mitsukuri Genpo, originally from Tsuyama Han (Okayama Prefecture), was a 'Tenmontaka' at Bakufu and was commissioned to serve as the translation official of 'Banshowagegoyou' in 1839. In June 1853 he translated the credentials of American President, Millard Fillmore (1800~1868) and in July 1853 he collaborated with Bakufu Diplomat Kawaji Toshiakira (1801~1868)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redentials of Russian Ambassador Evfemi Vasilievitch Putiatin (1803~1883). Later on, he served as the chief professor at 'Banshoshirabesho'. His brilliant foreign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world geography of whom influenced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policy of modernization in late Tokugawa Japan.

Shionoya Touin, Bakufu Junkan (in charge of Confucianism), born in Edo,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s good at sinology, winning the name of 'Japanese Oya Sho'. His works, including "Kakkaron" and "Chukaishigi," addressed the coast-defenses policy in Japan and he was once the vital assistant in Bakufu 'Tenpounokaikaku'. Touin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correspodence measures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Opium War and their impacts on Japan. He collected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edited it under the title "Afuyou Ibun" (7 volumes) and "Touin Sonkou". His works reflecte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is perspectives on China.

Sakuma Shouzan was a Hanshi of Shinshuu and was ordered to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American fleet at Uraga Port when, led by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it entered Japan in 1853. He had offered his strategy based on naval defense theory. Shouzan changed from supporting the nation-closure position to respecting the emperor and supporting the nation-opening position. "Sho Ei Ro" embodied his thought, and his stress on "Oriental values and Western arts" had an impact on Japan'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s well.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contrasts these three persons via the angle of their interaction and movement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Japan.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formation of ideology is explored and the roles of these three in that Japanese society shaped by both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ulture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Mitsukuri Genpo, Shionoya Touin, Sakuma Shouzan, interaction and movement, ideolog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